

## 「道大不容」：道學敘事以外的劉安世\*

張曉宇\*\*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 摘 要

北宋晚期思想史向以錯綜複雜而著名。在王安石 (1021-1086) 新學獨尊於上的大氣候下，不少士人選擇依附主流。但亦有些士人獨立王學以外，堅持找尋自己的求道之路。政治層面的黨爭，時常與思想潮流糾結在一起。學術政治，互為其根，而亦有兩者分道揚鑣之時。通過考察劉安世 (1048-1125) 這位傳統敘事中的「舊黨」士大夫和「道學」親近者，本文希望展現北宋士大夫複雜的一面。本文嘗試屏除後設的道學敘事，回到劉安世所處的歷史現場，利用他本人的奏疏和語錄，探討其政治理念、立場，以及他與程頤 (1033-1107) 乃至程頤門人的關係。這一研究不僅旨在重塑道學話語以外的劉安世，也希望透過剖析劉氏這一個案，可以為將來的宋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解構後設敘事的可能性策略。

**關鍵詞：**劉安世，程頤，道學，舊黨，《宋元學案》

---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計劃 (General Research Funding) 「從《宋元學案》出發再探十二世紀『程門』之建構與發展」(計劃編號：14608519，資助年度：2020-2022) 最終成果之一，以及同局資助計劃「記憶交匯之時：十二世紀前期的『題跋現象』」(計劃編號：14611722，資助年度：2023-2025) 初步成果。初稿宣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古籍研究所主辦，安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承辦，「第十一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蕪湖：2022年11月5-6日)，承蒙會上各專家指正。此外，《清華學報》匿名審查人以及編輯委員會前後就本文提出不少寶貴建議，惠我良多，謹致謝悃。筆者研究助理趙元瑩、鄭珮安君協助校訂文稿、格式，辛苦實多，致以特別感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ycheung@cuhk.edu.hk

## 一、前言

在宋代思想史領域中，北宋末年是一段難以處理的時期。客觀原因自然是由於史料限制：為北宋史研究奉為圭臬、蘊含豐富官、私史料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現存版本缺少了部分宋神宗 (r. 1067-1085)、宋哲宗 (r. 1085-1100) 以及全部宋徽宗 (r. 1100-1125)、宋欽宗 (r. 1126-1127) 等時期的卷數，導致追索北宋晚期史事大為不易。此外，儘管北宋中期私人文集已有印本流行，然而為兩宋之際亂局所影響，現存文集多為南宋紹興以後所印。北宋晚期許多重要人物，並無文集傳世。就思想史層面而言，最令研究者頭痛的深層原因，則為王安石 (1021-1086) 學術獨尊於上的大環境下，以張載 (1020-1077)、程顥 (1032-1085)、程頤 (1033-1107) 等學者為代表的各種學術潮流紛起，時而爭鳴，時而融匯。由於後世理學或曰道學話語佔據了優勢地位，加上史料稀缺，本來「眾聲喧嘩」的北宋末年思想界，在後世書寫中被化約為「道學崛起」的基本理路。無庸置疑，道學先驅包括二程兄弟、張載、邵雍 (1012-1077) 等，在當時思想界佔有相當分量。與之同時，許多北宋晚期士大夫與士人，由於他們和二程、張、邵及其弟子的交遊，也被後世認為是道學親近者，甚至是廣義的「道學家」。<sup>1</sup> 本文所聚焦的主角劉安世 (1048-1125)，正是這樣一位士大夫。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河北大名府人，北宋晚期名臣，亦是司馬光 (1019-1086) 的弟子。作為政治家，他名聲顯赫，廣播域外。<sup>2</sup> 作為思想家，《宋

<sup>1</sup> 本文指涉北宋末年思想語境時，寧取「道學」而非理學一詞。這是因為作為理學核心的「天理」概念，在北宋末年並未成為以二程、張載為代表的學者團體共同追求。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時段固然處於後世所謂「理學」之誕生期，但考慮到當時人的習慣，「道學」毋寧說是他們更為理解的術語。關於「道學」詞義的梳理以及澄清這一詞義的重要性，參 Hoyt Cleveland Tillman (田浩)，"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 (1992), pp. 455-474. 由此一詞義辨析所引發的論戰，參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Use of Neo-Confucianism: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Tillm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3 (1993), pp. 541-555; Hoyt Cleveland Tillman, "The Uses of Neo-Confucianism, Revisited: A Reply to Professor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 (1994), pp. 135-142; Wm. Theodore de Bary, "Reply to Hoyt Cleveland Tillm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 (1994), pp. 143-144.

<sup>2</sup> 記載朝鮮李朝史事的典籍《李朝實錄》所錄群臣奏疏即屢次徵引劉安世言行，以佐治道。《成宗實錄》，收入齋藤孝等編纂，《李朝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3-1967，以下均採用該版本），卷 295，「二十五年五月戊子」，頁 1b；《中宗實錄》，卷 59，「二十二年八月

元學案》列有他的專案〈元城學案〉，由全祖望 (1705-1755) 補訂。全氏補本重點有二，一是強調劉安世與司馬光的學術傳承，認為安世繼承了司馬光的「剛健」之氣。二是指出劉安世著作如《元城先生語》、《譚錄》、《道護錄》等，清初時已無完本，只能考見大略。<sup>3</sup> 前一重點標示了劉安世的政治譜系屬於舊黨一派。後一重點提出的三部殘本著作，都是劉安世晚年和年輕士人的對談記錄。這三部對談均被收入南宋前期編成的《諸儒鳴道集》之中，而《諸儒鳴道集》向被視為早期道學材料匯總。全祖望〈元城學案〉中補入的劉安世語錄材料，大抵不出三部對談之藩籬。

全祖望〈元城學案〉的基本論調，乃是對道學大儒朱熹 (1130-1200) 以降狹義道學敘事的修正。朱熹在早期道學史名著《伊洛淵源錄》中，將司馬光的學術系譜排除在道學正統以外。全氏補本〈元城學案〉乃據《元城先生語》、《譚錄》、《道護錄》三書，試圖重建北宋末年司馬光—劉安世這一系另類「道學」實相。這一新補學案，與《諸儒鳴道集》所蘊含的廣義「道學」文獻世界遙相呼應，可以說具有相當程度的歷史眼光。<sup>4</sup> 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之早期版本《宋元學案》，全祖望前期補修黃宗義《宋元儒學案》時，已然補入〈元城學案〉。<sup>5</sup> 之

庚午」，頁 49a；《光海君日記》，卷 19，「元年八月甲戌」，頁 11b；《孝宗實錄》，卷 12，「五年六月乙亥」，頁 36a；《肅宗實錄》，卷 60，「四十三年七月辛酉」，頁 2a；《英祖實錄》，卷 42，「十二年七月丁酉」，頁 2a。

<sup>3</sup> 黃宗義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0，頁 820-821。

<sup>4</sup> 關於《諸儒鳴道集》的價值，田浩、陳來、邱佳慧等都有專論述及。此書包括二程、司馬光、周敦頤、張載、楊時、謝良佐、劉安世、江公望 (?-1130)、潘殖、劉子翬 (1101-1147)、張九成 (1092-1159) 各人作品及語錄，可謂早期道學史文獻淵海。這部總集成書時間爭議較大。據田智忠新近專門研究，《諸儒鳴道集》原刻成書時間上限為乾道二年 (1166)，下限大概是乾道四年或稍後，與朱熹整理本《河南程氏遺書》成書時間相近。田智忠，《〈諸儒鳴道集〉研究——兼對前朱子時代道學發展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第 1 章，〈《諸儒鳴道集》原刻年代考〉，頁 48。此集有晚宋刻本傳世。下文引用《諸儒鳴道集》所收《元城先生語》、《譚錄》、《道護錄》三書，均以上海圖書館藏南宋端平刻本為準。佚名編，《諸儒鳴道集》，《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 19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南宋端平刻本）。

<sup>5</sup> 這一早期版本乃由黃宗義後人黃璋、黃徵又先後補修而成，張藝曦稱為黃氏補本《宋儒學案》，共七十八卷，較接近黃宗義《宋元儒學案》原貌。全氏門生盧鎬 (1723-1785) 曾寄送全祖望續修《宋儒學案》部分底稿（共二十冊）予黃璋，所以黃氏補本包括了一些全祖望前期修訂內容。至於全氏晚年修訂稿，因盧鎬未及謄寫、寄送，不見於黃氏補本。今考黃氏補本，卷十七乃全氏所補〈元城學案〉，可證全氏前期已補修完成此案底稿。參張藝曦，〈史語所藏《宋儒學案》在清中葉的編纂與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3（臺北：2009），頁 451-506。黃氏補本〈元城學案〉目錄，見黃璋、黃徵又補修，《宋儒學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稿本），卷 17，頁 1。

後續補《宋元學案》的王梓材(?-1851)強調「是卷謝山所特立，故梨洲、主一父子皆無案語」。<sup>6</sup>王梓材與馮雲濠(1807-1855)後撰《宋元學案補遺》，輯補〈元城學案〉部分乃循依全祖望的歷史文獻進路，據宋人筆記並《朱子語類》言及劉安世者補入材料。<sup>7</sup>

《宋元學案》以及《宋元學案補遺》搜羅的文獻，豐富了我們對劉安世乃至他所身處思想世界的認識。如前文所言，這一思想世界，在廣義上常被定性為以「道學」或曰「求道之學」為主流的學問共同體。劉安世作為提攜二程之司馬光學生、道學名家楊時(1053-1135)好友，常被認為是道學支持者。有學者更以為劉安世在早期道學傳承中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作用。<sup>8</sup>無庸置疑，《宋元學案》以及《宋元學案補遺》所搜羅的一些材料增進了我們對劉安世與道學關係的一些理解。但是，這兩部文獻總集對劉氏面目的勾勒亦有明顯副作用。簡要而言，《宋元學案》將我們對劉安世的認知囿限在以「誠」為本、敢言直諫、與程頤之學殊途而同歸幾個方面。現今探討劉安世的幾種研究，多就上述幾方面展開立論，認為劉安世作為一位不畏強權的舊黨言路官，在政治和學術層面，和北宋晚期道學學者屬於「同調」合作關係。<sup>9</sup>回到劉安世所處的歷史現場，他的政治理念、立場，以及他與程頤乃至程頤門人關係，有著相當不同於傳統道學敘事的面貌。此外，宋史學界對現存劉安世奏議集成《盡言集》十三卷利用不多。<sup>10</sup>這批奏議對理解劉安世政治理念頗有幫助。下文根據《盡言集》、《元城先生語》、《譚錄》、《道護錄》等第一手文

<sup>6</sup>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20，〈元城學案〉，頁821。

<sup>7</sup> 王梓材、馮雲濠撰，張壽鏞校補，《宋元學案補遺》，收入張壽鏞輯，《四明叢書》第5集（張氏約園雕版印行本，1937），卷20，〈元城學案補遺〉，頁3b-6b。

<sup>8</sup> 邱佳慧，《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1。

<sup>9</sup> 相對全面的劉安世研究，仍屬邱佳慧的碩士論文。此文逐項分析了劉安世的家世、師承、學術網絡及傳承，為後來者進一步研究劉安世提供了充分基礎。其他以劉安世為題之論文，多就〈元城學案〉的幾項基本論調立論，輔以其他相關材料，平鋪直敘劉安世思想特質和政治事功。基本上可視為〈元城學案〉「再補遺」。略舉數例：占旭東，《〈盡言集〉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成鵬，《劉安世政治思想述論》（石家莊：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9）；王淑梅，〈以「誠」為道：劉安世治學為政思想〉，《河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天津：2021），頁39-44。此外，連凡有兩篇專門討論〈元城學案〉的論文，涉及全祖望對劉安世的評價。參連凡，〈論《宋元學案》對朔學的詮釋與評價——以司馬光及其弟子劉安世、范祖禹、晁說之為中心〉，《保定學院學報》，6（保定：2017），頁1-7；連凡，〈全祖望對司馬光及其弟子思想的詮釋與評價〉，《焦作大學學報》，3（焦作：2018），頁5-13。

<sup>10</sup> 《盡言集》外，劉安世另有文集《元城集》二十卷，惜已不傳。《盡言集》版本概況，另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553-555。

獻，嘗試呈現道學敘事以外的劉安世形象。<sup>11</sup> 本文主標題引自劉安世好友楊時為安世所撰祭文。文中感惜後者「道大不容」，被貶南荒。<sup>12</sup> 劉安世之「道」究竟為何「道」？與普遍所見的道學敘事又有何不同？下文先考辨劉安世的政治理念及官僚身分，進而論析劉安世與程頤之間的政治張力以及劉氏與程頤弟子楊時的學術交往。這三個面向大概對應以《宋元學案》為代表的傳統道學敘事對劉安世的重點理解。通過討論這些面向，本文希望能夠重塑道學敘事以外的劉安世。

## 二、劉安世的言路官理念

劉安世早年生涯，受舊黨元老文彥博 (1006-1097)、司馬光影響頗深。安世父劉航 (?-1082) 與司馬光為同年進士。劉航任西京河南府監牧使時，遣子劉安世拜入司馬光門下，與光之子司馬康 (1050-1090) 同學。<sup>13</sup> 熙寧六年 (1073)，劉安世進士及第，調任洛州司法參軍，開始他的宦宦生涯。<sup>14</sup> 熙寧六年一科，正在王安石新政如火如荼之時。熙寧四年，在王安石主導下朝廷頒佈了貢舉新制，罷詩賦，以經義取士。<sup>15</sup> 熙寧六年榜正是以經義取士的第一榜。劉安世作為司馬光門生得中此榜，與當時流行的新學大氣候格格不入。元修《宋史》史官大概考慮到這一點，傳文遂云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之說。<sup>16</sup> 按照這一說

<sup>11</sup> 南宋大儒朱熹在編輯《三朝名臣言行錄》時，就上述幾部語錄，加上經眼的一些劉安世「言行」文字，做了一些摘抄。參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子全書》第 2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 81，〈跋劉元城言行錄〉，頁 3829。朱氏摘抄的劉安世「言行」，大概皆兩宋之交坊間流傳文字。政治先設立場明顯，史料說服力不如《諸儒鳴道集》所收的幾部語錄以及劉安世本人奏議。

<sup>12</sup> 楊時撰，林海權校理，《楊時集》（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28，〈祭劉器之〉，頁 743。

<sup>13</sup> 此據劉安世自述，韓瓘錄，《劉先生譚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2，頁 1a。

<sup>14</sup> 劉安世並無墓誌銘或行狀傳世，最重要之生平傳記，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下卷 19，〈劉諫議安世傳〉，頁 11a-14b。此傳史源應為淳熙四年 (1177) 由國史院領銜修成之重修《徽宗實錄》中的臣僚傳記。傳記史源無法細考。但重修《徽宗實錄》修撰、檢討為大史學家李燾 (1115-1184)、呂祖謙 (1137-1181)，所修各傳多詳實，是研究劉安世生平重要材料。至於元修《宋史》劉安世本傳，則多參考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所摘抄之安世軼事，與《實錄》文字多有不同。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1-10955。元修《宋史》此傳頗有問題，見下文。

<sup>15</sup>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選舉〉3 之 44，頁 5308。

<sup>16</sup> 脫脫等，《宋史》，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2。

法，劉氏因為尊崇舊黨之司馬光，所以拒絕出仕。但是，如果我們考察南宋孝宗中期重修《徽宗實錄》所收的劉安世本傳，則知劉安世中舉後曾「調洛州司法，就辟高陽帥幕」。<sup>17</sup> 中間因服父喪回鄉。守服完畢後，轉任河南府左軍巡判官。<sup>18</sup> 他的早年宦途實無拒絕出仕之事。此外，《宋史》提及劉安世出仕前為文彥博賞識，曾在其面前宣言王安石新政若不遂眾人心，其改正在「反掌間耳」。<sup>19</sup> 這一段軼事，在重修《徽宗實錄》劉安世本傳中，也是看不到的。比較《徽宗實錄》所收劉安世本傳以及元代官修正史，不難看出後者特別強調早年劉安世親近舊黨的形象。這一形象在後來的書寫中屢次出現，成為了他的政治基調。<sup>20</sup>

劉安世後來的仕官歷程，前人已有扼要論述。<sup>21</sup> 他的政治高峰時期，集中於舊黨柄政的元祐時代。自元祐三年（1088）二月劉安世被擢為右正言始，一直到元祐六年中改任樞密都承旨為止，他一直任職號稱「天子耳目」的言路官之職（右正言—左司諫／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即以劉氏《盡言集》為例，其中大部分奏文均進呈於這三年之間，尤以元祐三年二月至元祐四年六月為最。

劉安世作為言路官而活躍的元祐時期，是在宣仁太皇太后垂簾體制下、舊黨主導朝政的政治變革期。平田茂樹指出，元祐三年至四年之間，中樞政治歷經由司馬光、呂公著（1018-1089）等元老派向劉摯（1030-1097）為代表的青壯派過渡的現實。這一舊黨內部的權力轉移，除了宰執人選更替以外，以臺（御史臺）、諫（諫院）、給（給事中）、舍（中書舍人）為代表的言路官，在這一過程中大為活躍，成為了另一處政治核心。正如平田氏所言，以劉摯集團為代表的元祐中後期政治史，可以視為元祐言路官的政治史。<sup>22</sup> 劉安世的政治理念與立場，需要在言路官身分這一前提下才能準確把握。

回到劉安世元祐三年初任言路官時的歷史語境。這一時期的劉安世，常被認為是由京東東路、河北東路二路北方士大夫所組成的「朔黨」成員之一。黨魁是當時

<sup>17</sup> 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 19，〈劉諫議安世傳〉，頁 11a。

<sup>18</sup> 劉安世轉任河南府左軍巡判官時間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哲宗元祐初即位前，劉氏已任此職。參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380，「元祐元年六月壬寅」，頁 9222。

<sup>19</sup> 脫脫等，《宋史》，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2。此條軼事出於劉安世自述，韓瓘錄，《劉先生譚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2，頁 5a。

<sup>20</sup> 元明以降各種文獻，基本因襲元修《宋史》所記劉安世「登第不就選」之說，尤以地方志為最。

<sup>21</sup> 邱佳慧，《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頁 22-26。

<sup>22</sup> 平田茂樹著，林松濤、朱剛等譯，《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宋代的言路〉，頁 57-97，尤其是頁 74-77。

執政大臣劉摯。近來研究指出，「朔黨」本身乃是相對後出的政治集團概念，建基於兩宋之交一部可信度存疑的私人筆記之上。<sup>23</sup> 即使將「朔黨」視為廣義的劉摯集團，從政治立場來說，這一集團內部亦可謂鬆散。<sup>24</sup> 元祐三年八月，劉安世即遞進一奏，彈劾宰執引用親屬以為在京差遣。此奏提及時任中書侍郎的劉摯與尚書左丞王存 (1023-1101) 雖然「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亦應負上罪責。<sup>25</sup> 劉摯、王存以外，在元祐三年八月一奏中，劉安世所批評之對象還包括了文彥博、呂公著、呂希純、范祖禹 (1041-1098)、呂大防 (1027-1097)、范純仁 (1027-1101) 等舊黨元老在內。儘管劉安世將這種不良政治風氣追溯至王安石執政的熙寧時期，但是他的實際批評對象均為元祐宰臣。

劉安世三年八月奏中針對宰執的嚴厲批評，蘊含了他身為言官的強烈自覺。這種自覺主要緣自他本人對熙寧以來王安石控制言路的反感。<sup>26</sup> 奏文前半部分數次強調「祖宗」立法，本意執政大臣親戚子弟不可授內外華要之職。<sup>27</sup>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注意劉安世對言路官的理解異於其他同僚。劉任右正言本為呂公著或劉摯推薦。<sup>28</sup> 按照北宋政治黨派一般運轉邏輯，首任言路官的劉安世，不至於即刻彈劾呂公著和劉摯。然而在劉氏看來，只有人主才有提攜任官之權，私恩不能代替公

<sup>23</sup> 即邵伯溫 (1057-1134) 撰寫、邵博 (?-1148) 整理的《邵氏聞見錄》。其中記載，「朔黨」與以程頤為代表的「洛黨」及以蘇軾、蘇轍 (1039-1112) 兄弟為代表的「蜀黨」並列，構成元祐黨爭基本形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3，頁 146。葉健孚君撰有專文，考證「朔黨」概念在北宋晚期相關文獻中的建構過程。詳參葉健孚，〈歷史記憶的重塑：「洛蜀朔黨」考辨〉，收入《第二十屆兩岸四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中國古代史卷》（開封：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9），頁 246-248。

<sup>24</sup> 平田氏已指出劉摯集團包括不少新法黨人。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研究》，〈宋代的言路〉，頁 69-70。關於「朔黨」的鬆散性質，並參梁思樂，〈北宋朋黨政治研究模式的回顧與展望——以「洛蜀朔黨爭」說法為例〉，收入蔡崇禧、鄒陳惠儀、梁思樂主編，《研宋三集》（香港：香港研宋學會，2016），頁 47-62；梁思樂，〈朔黨與北宋元祐朋黨政治新論——以元祐五年以前朔黨與韓忠彥、文彥博、范純仁的關係為中心〉，收入中國宋史研究會第 16 屆年會編，《「10 至 13 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 16 屆年會論文集》（杭州：杭州師範大學，2014），頁 100-123。

<sup>25</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四部叢刊續編》第 2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 1，〈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一，頁 9b。

<sup>26</sup> 王安石對言路的控制，參熊本崇著，馬曉地、輪田直子譯，〈權監察御史里行李定——關於王安石的對御史臺政策〉，收入近藤一成主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51-72。劉安世曾親言熙寧臺諫皆王安石之黨，據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0，頁 3b。

<sup>27</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一，頁 8a。

<sup>28</sup> 《宋史》曰呂公著，《徽宗實錄》所收傳記曰劉摯。脫脫等，《宋史》，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2；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 19，〈劉諫議安世傳〉，頁 11a。

職。在此奏貼黃部分，劉安世補充：「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既犯眾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sup>29</sup>這幾句自白之語，說明劉安世深明奏文可能導致的後果。但是他的自我定位，卻無涉於當時官僚集團所習慣的朋黨人際關係，而是個人作為「天子耳目」的職責。作為言路官的劉安世，與其說是劉摯或某一政治集團成員，毋寧說他是在貫徹言路官獨立進言的宗旨。就此而言，認為劉安世屬於「朔黨」或是所謂劉摯集團，恐怕都不盡準確。<sup>30</sup>他的自我認同，乃是成為言路官表率。

元祐三年八月一奏，體現了劉安世獨往獨來的政治理念。他在晚年與高郵士人馬永卿的對談中，談到舊日目睹司馬光處事方針，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朝廷弊端，而從不與士大夫閒談論政。<sup>31</sup>劉安世進奏時「遍及柄臣」，不考慮黨派政治關係，正是受司馬光影響之處。縱觀《盡言集》所收劉安世元祐時期各種論奏，彈劾對象既有蔡確（1037-1093）、章惇（1035-1105）、王子韶（?-1098）、謝景溫（1021-1097）等廣義之「新黨」官僚，亦有胡宗愈（1029-1094）、范純仁、王存、范育（?-1095）、李常（1027-1090）等傳統被歸類為舊黨的士大夫。

史家常以劉安世元祐四年連上十數奏極論蔡確車蓋亭詩案，以茲證明劉安世屬於廣義層面的舊黨成員。但是，早至元祐三年四月，劉安世亦曾連續論奏胡宗愈不當除尚書右丞。胡氏熙寧年間反對王安石擢用李定（?-1087）壟斷言路，被貶真州，可以說是恪守氣節的舊黨官僚典範。劉安世在彈章中亦承認「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飭」。<sup>32</sup>元祐舊黨得勢後，胡宗愈得到重用，由中書舍人、給事中進為御史中丞，達到了言路官系統頂點。<sup>33</sup>然而在劉安世看來，胡氏在神宗朝雖然「頗有可稱」，但在哲宗元祐時期卻背公徇私，薦用妻族親戚丁騭。<sup>34</sup>丁騭在熙寧新法年間不肯任職，大為呂公著、司馬光所稱許，屬於舊黨人。<sup>35</sup>胡宗愈向司馬光推薦丁騭之時，司馬光且云：「士大夫無不登光門者，而騭不來，真自重之

<sup>29</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1，〈論差除多執政親戚〉貼黃，頁11b。

<sup>30</sup> 劉安世在劉摯死後為其文集撰序，常被認為是與劉摯關係密切的證明。然而序文主體均圍繞劉摯公職而發揮，關於二人交誼部分只有起首寥寥數語，並無長期交遊的充分證據。見劉摯撰，裴汝誠、陳曉平點校，《忠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原序〉，頁666。

<sup>31</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50，頁1a。

<sup>32</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3，〈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一，頁1b。

<sup>33</sup> 脫脫等，《宋史》，卷318，〈胡宗愈傳〉，頁10370。

<sup>34</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3，〈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頁3b。

<sup>35</sup> 事見呂公著《掌記》並蔣之奇（1031-1104）撰〈丁騭墓誌〉，轉引自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02，「元祐二年六月戊申」，頁9790。



士」。<sup>36</sup> 同為司馬光所看重的劉安世，卻以為胡宗愈推薦丁儻乃出於「歸惠於己」的私心。胡宗愈另外推薦文彥博孫婿李慎由，出於舊黨相族門戶。劉安世亦認為李氏「苟徇權貴」，有違「公議」。<sup>37</sup>

劉安世批評胡宗愈之時，提到胡氏曾為新黨黨魁蔡確所引用，且在擔任御史中丞期間無意彈劾蔡氏與章惇。這一批評並不足以說明劉安世以胡為新黨。同奏中他更加強調的是胡宗愈與舊黨元老呂公著、文彥博的姻親與薦引關係。<sup>38</sup> 尤其值得注意，在其中一次彈章中，劉安世引用了先朝神宗皇帝手詔批付中書「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托公」數語。<sup>39</sup> 這幾句話，本出於熙寧三年六月神宗與王安石、曾公亮 (999-1078) 議政之時，王安石厭煩胡宗愈屢次批評新法，遂奏請神宗御批中書，加重貶詞，以張其罪。<sup>40</sup> 司馬光的私人日記也記錄了這件事，且以為這幾句「御批」實乃呂惠卿 (1032-1111) 所作。<sup>41</sup> 無論「御批」作者屬誰，劉安世以熙寧流行的政治話語批評胡宗愈，可見他的批評重心無關於「新」、「舊」黨爭，而是主要針對士大夫「觀望迎合之迹」。<sup>42</sup> 不管新黨還是舊黨，只要有聯群結黨形跡，都會成為劉安世彈劾對象。即使胡宗愈為呂公著、文彥博甚至恩師司馬光所薦引，劉安世仍一再堅持彈劾胡氏。<sup>43</sup> 時傳劉氏有云：「惟願士大夫有此名節，而不願士夫立此門戶」。<sup>44</sup> 此語是否實出於劉安世之口，難以確考。但說劉氏任職言路時重「名節」而輕「門戶」，可謂的論。

在彈劾胡宗愈一事上，亦有其他數位言官如孫覺 (1028-1090)、趙挺之 (1040-1107)、楊康國等與劉氏共同進退。這些言官均為胡氏所提拔，其因公忘私、彈劾胡氏之舉，構成了劉氏所稱的「公議」。有學者認為，劉安世所重視的「公議」以言路體系為基礎，亦容易異化為少數言路官員所壟斷的專斷型「橫議」，反而破壞了「公議」原來追求的大公至正精神。言路官甚至可能被某些政治團體利用成為攫

<sup>36</sup> 同前引。

<sup>37</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3，〈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頁4a。

<sup>38</sup> 同前引，〈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八，頁14b、15b。

<sup>39</sup> 同前引，〈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頁4b。

<sup>40</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12，「熙寧三年六月丙戌」，頁5159。

<sup>41</sup> 司馬光日記轉引自同前引，頁5160。

<sup>42</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3，〈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頁4b。

<sup>43</sup> 劉安世彈奏中沒有直接提及司馬光。但據太皇太后高氏所述，司馬光實為早期引薦胡宗愈的有力大臣之一。參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11，「元祐三年五月癸亥」，頁10004。

<sup>44</sup> 安世語轉引自南宋林駟所編科考用書。林駟編，《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臺北：新興書局，1970，明末翻刻元圓沙書院本），卷4，「君子」，頁419。

取利益的工具。<sup>45</sup> 其實劉安世本人已然警覺到這一問題。與彈劾胡宗愈同時，劉氏在元祐三年另有一次彈奏，由於涉及道學宗師程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尤顯特出。下文細加分梳。

### 三、劉安世與程頤之間的政治張力

元祐三年五月，與彈劾胡宗愈同時，時任右正言的劉安世連上九奏彈劾考功員外郎歐陽棐 (1047-1113)，指責歐陽棐差除著作郎兼實錄院檢討不當。歐陽棐乃名臣歐陽修之子，生平大略可參畢仲游 (1047-1121) 所撰〈歐陽叔弼傳〉。<sup>46</sup> 他承受家學，詞章表奏文字甚佳，在同輩中令譽頗高。<sup>47</sup> 哲宗親政及徽宗重推新政時期，歐陽棐均因所謂「黨附」元祐大臣而遭黜降。<sup>48</sup> 劉安世彈劾歐陽，曰其交結執政，取悅權門。考歐陽棐治平四年 (1067) 中進士後，並無鑽營之事，於官祿且多推卻。<sup>49</sup> 劉安世連番上奏抨擊，主要是因為歐陽棐與胡宗愈屬於姻親，安世認為二人結黨營私。<sup>50</sup> 此外，歐陽棐、胡宗愈，以及上文提及另一位由胡氏推薦的丁騭，皆出於歐陽修門下。<sup>51</sup> 劉安世與歐陽修雖無直接關係，然而其師司馬光與歐陽修在宋英宗「濮議」討論中一為言官，一為執政，立場迥異，爭執不斷。安世元祐三年連番彈劾歐陽修門人，亦可視為北宋中葉以來、言路官針對執政集團干涉

<sup>45</sup> 張建坤，《元祐學術群體的政治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博士論文，2019），頁 174-186。

<sup>46</sup> 畢仲游，《西臺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6，〈歐陽叔弼傳〉，頁 26b-33a。

<sup>47</sup> 元祐七年歐陽棐升任禮部員外郎後，亦曾積極參與當時朝廷禮制討論，尤其是南北郊合祭分祭之禮。同前引，頁 29b-30a。據歐陽棐自述，他對宗祀大禮的理解乃源自其父歐陽修所修《新唐書·禮樂志》。

<sup>48</sup>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 8 冊，〈職官〉67 之 22，頁 4859。徽宗崇寧二年 (1103)，歐陽棐名列元祐黨人碑中人。同前引，〈職官〉68 之 9，頁 4877。

<sup>49</sup> 畢仲游，《西臺集》，卷 6，〈歐陽叔弼傳〉，頁 29b-30a；龔延明、祖慧，《宋代登科總錄》第 2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1003。呂希哲評價歐陽棐「最為靜默」，不解劉安世何以針對其人。呂本中撰，韓西山輯校，《呂本中全集》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童蒙訓》，卷中，頁 994。

<sup>50</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一，頁 9b。

<sup>51</sup> 丁騭為嘉祐二年 (1057) 進士，正是歐陽修知貢舉、大變文風的一年。丁騭與胡宗愈、蔣之奇、張巨，號為四友，曾學《易》於歐陽修。參史能之編修，《咸淳昆陵志》，收入中國地志研究會編，《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6 冊（臺北：大化書局，1990，明崇禎十一年 (1638) 刊本影印本），卷 17，「人物」，頁 12a-12b。故此，胡、丁、張在《宋元學案》中皆被歸類為歐陽修門人。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4，〈廬陵學案〉，頁 209-210。

言路的一次集中體現。

尤其重要者，劉安世的彈奏不僅針對歐陽棐，更涉及元祐初年某些中下層官僚交結執政的普遍現象。劉安世認為，這批官僚象徵了朝局大變時官僚系統中的投機者。除了交結執政權門，這批投機者還具有「陰邪附會」的特色，故而稱為「五鬼」。<sup>52</sup> 劉安世針對「五鬼」最著名的一句批評曰：「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sup>53</sup> 被點名的「五鬼」除歐陽棐外，還有畢仲游、孫朴、楊國寶 (?-1094)，以及道學宗師程頤。由於程頤後世的聲望，且劉安世被認為屬於親近「道學」的士大夫，元祐「五鬼」之說成為了早期道學史中的一道難題。道學大家朱熹在與弟子包揚對話中，含糊批評劉安世「見識有病。……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sup>54</sup> 然而劉安世論列程頤的「見識」究竟由何而來？

要解答上述問題，不妨先考察「五鬼」之說背景。「五鬼」之名，本出於道教星宿命理之說，唐代高道杜光庭 (850-933) 九宮、九曜醮詞多見此名。<sup>55</sup> 唐宋以降，此詞逐漸被用來諷喻投機官僚。南唐李景 (r. 943-961) 時，吳人以馮延巳 (903-960)、馮延魯、陳覺 (?-959)、魏岑、查文徽聯群結黨，壟斷朝政，號為「五鬼」。<sup>56</sup> 後蜀後主孟昶 (r. 934-965) 好文學，歐陽炯 (896-971)、韓琮、閻選、毛文錫、鹿虔扈以工小詞而得以進用，亦號「五鬼」。<sup>57</sup> 入宋以後，宋真宗時有王欽若 (962-1025)、丁謂 (966-1037)、劉承珪 (又名承規，949-1012)、陳彭年

<sup>52</sup> 朝臣中反對「五鬼」之說者，可參元祐二年九月侍御史王覲一奏，以及元祐三年三月左正言丁騶一奏。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5，「元祐二年九月庚申」，頁 9867；卷 409，「元祐三年三月癸亥」，頁 9955。

<sup>53</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歐陽棐差除不當〉八，頁 21b。

<sup>54</sup>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30，「自熙寧至靖康用人」，頁 3107。根據黎靖德本書前〈朱子語錄姓氏〉一表，知朱子與包揚對談集中於孝宗淳熙十年至十二年（1183-1185）。此條談話即發生於這二年之間，後被蔡杭採入饒州刊印的《朱子語後錄》之中（黎本《語類》簡稱為《饒後錄》。此錄共二十六卷，淳祐九年（1249）刊行）。筆者翻查更早時期由黃士毅所編《朱子語類》，即眉州刊行之《蜀類》，並無此條與包揚之對談。考黃士毅本《蜀類》刊行於嘉定十二年（1219），時《饒後錄》尚未刊印，黃本不可能採入此條。黃本相關內容，參黃士毅編，徐時儀、楊艷彙校，《朱子語類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 130，「自熙寧至靖康用人」，頁 3099-3133。關於黃本《蜀類》版本流傳及價值，參同前引，〈前言〉，頁 23-42。

<sup>55</sup> 董誥等編，孫映達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卷 936-938，頁 5747-5761。

<sup>56</sup> 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62，〈李景傳〉，頁 770。

<sup>57</sup> 吳任臣撰，徐敏震、周瑩點校，《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56，〈鹿虔扈傳〉，頁 815。

(961-1017)、林特 (?-1026) 等高級官僚專政，時號「五鬼」。<sup>58</sup> 其中除劉承珪為內臣外，王、丁、陳、林都曾擔任中書門下並樞密院等兩府要職。宋仁宗慶曆變法時，歐陽修彈劾翰林學士李淑 (1002-1059)，斥其黨附呂夷簡 (979-1044)，在「『三尸』、『五鬼』之數」。<sup>59</sup> 這一以交結執政為「鬼」的修辭用法，已非常接近劉安世元祐三年奏章中的語境。

考察元祐「五鬼」背景，的確有幾位出身於執政大臣家庭。歐陽棐為歐陽修之子，前文已有述論。畢仲游是真宗朝名相畢士安 (938-1005) 之孫。孫朴乃孫固 (1016-1090) 之子，其父元豐初年曾任同知樞密院事，為西府大臣。此外，歐陽棐亦為孫固姻親。<sup>60</sup> 楊國寶為呂公著外甥，<sup>61</sup> 曾從邵雍讀書，亦與程頤交好。<sup>62</sup> 元祐元年六月，舊黨執政不久，尚書右僕射呂公著馬上舉薦了畢仲游和孫朴，時任同知樞密院事的范純仁同時進薦楊國寶。朝廷詔令各人赴闕，令試翰林學士院。<sup>63</sup> 劉安世為司馬光所薦，也在元祐初年這一次大規模起用人材中。這是劉安世與「五鬼」第一次在朝廷中同樞出現。到了元祐三年，呂公著、孫覺、范純仁、王存等大臣再次交相薦引「五鬼」，加以胡宗愈的關係，引起了劉安世關注。在特立獨行的劉安世看來，「五鬼」的人際網絡牽扯到眾多執政大臣，自然具有結黨營私的危險。他在攻擊歐陽棐奏文中，所論「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諸語，乃針對元祐元年至三年這數年間、「五鬼」通過執政人際網絡得以不斷進用之事實。<sup>64</sup>

但是，「五鬼」之中，程頤並非執政直屬子弟，亦非進士出身，而是白衣士人。劉安世針對程頤的理由還需要從其他方面來解釋。首先，呂公著等執政元祐元

<sup>58</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8，「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頁 1788。張維玲已留意到真宗「五鬼」問題，並指出「五鬼」分為禮儀派和財政派，前者才是宋真宗一系列神道設教的推動者。張維玲，《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頁 116-124。

<sup>59</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43，「慶曆三年九月丙子」，頁 3448。

<sup>60</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歐陽棐差除不當〉八，頁 21b。

<sup>61</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13，「元祐三年八月辛丑」，頁 10045。

<sup>62</sup>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 20，頁 224；朱熹，《伊洛淵源錄》，《四庫善本叢書初編》第 315 冊（新北：藝文印書館，1965，影印中央圖書館藏明本四庫善本叢書），卷 7，頁 6b-8a。洛陽偃師商城博物館新近徵集到一方墓誌，誌主為程頤早年門生劉絢，其篆蓋者即楊國寶，可見程、楊之親近。相關資訊，參羅火金、鄧新波、黃吉軍，〈北宋理學家劉絢墓志考釋〉，《洛陽考古》，3（洛陽：2021），頁 82。

<sup>63</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80，「元祐元年六月壬寅」，頁 9222-9223。

<sup>64</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歐陽棐差除不當〉四，頁 15b。

年薦舉「五鬼」其他成員之前，元豐八年（1085）十一月，呂氏已與司馬光共同推薦程頤，稱許其學行堪為真儒，程頤乃以布衣身分被擢為西京國子監教授。<sup>65</sup> 在劉安世眼中，自元豐末年以來，以呂公著為中心逐漸形成一個權閥集團，程頤亦在其中。南宋晚期俞文豹在其筆記《吹劍錄》中提到道學黨禁之始，緣因元祐時程頤「出入呂申公之門」，導致孔文仲（1037-1087）等言路官將其視為「呂門五鬼之魁」。<sup>66</sup> 其實早在熙寧八年十月，程頤已為呂公著作書上神宗皇帝以論星變政事。<sup>67</sup> 「五鬼」或為呂公著所推薦，或為其親屬。而公著在程頤白身時已青眼有加，乃以重要奏文相託。「五鬼」這一人際網絡既以呂公著為中心，而程頤與其相識甚早，這大概是劉安世反感程頤的直接理由。

更令劉安世警惕者，乃是執政以外不少言路官同僚對程頤不遺餘力的支持。元祐二年八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專奏彈劾程頤在朝時常交結言路。此條材料切要，茲詳引如下：

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利，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竊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之，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時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嘗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

<sup>65</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1，「元豐八年十二月丁巳」，頁 8649。司馬光薦語見司馬光，《傳家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4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 49，〈與晦叔同舉程頤〉，頁 372。

<sup>66</sup> 俞文豹撰，張宗祥校訂，《吹劍錄全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吹劍四錄》，頁 95。南宋史學家李心傳（1167-1243）疑孔文仲「五鬼之魁」語有誤。見李心傳撰，程榮秀刪補，《道命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5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影元抄本影印），卷 1，〈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頁 6a。據蔡涵墨先生研究，《道命錄》有李心傳原本（《永樂大典》殘本）與元代程頤後人程榮秀（1263-1333）刪補本之別。Charles Hartman, "Bibliographic Notes on Sung Historical Works: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Way and Its Destiny (*Tao-ming lu*) by Li Hsin-ch'ua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0 (2000), pp. 1-61. 此條李心傳按語，二本論「五鬼」處均同，當出於李心傳原文。不過，孔文仲確曾嚴厲批評程頤，詳參下文。程頤為「五鬼」魁首說法並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22，頁 170。

<sup>67</sup> 程頤、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河南程氏文集》，卷 5，〈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頁 529-532。李燾考證，呂公著最後自己另撰奏文，而不用頤奏。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69，「熙寧八年十月丁巳」，頁 6617。然而此奏據星變批評新法，關係天下大政。呂公著先以付程頤作書，足見親重。

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sup>68</sup>

孔文仲針對程頤的批評主要分為「徧謁貴臣」和「歷造臺諫」兩部分。尤其是「歷造臺諫」，上述引文有非常生動的描繪。據孔文仲自述，他擔任言路官後，程頤即來訪討論諫院人事安排，極論助賈易而去呂陶（1031-1107）之必要。賈易以外，孔奏中提及的朱光庭（1037-1094）本為程頤及其兄程顥弟子，元豐末年時已屢薦程頤入朝。<sup>69</sup> 朱熹所編《河南程氏外書》卷一、卷二諸條，原本即為朱光庭抄錄、問學二程之語。<sup>70</sup> 程頤自元祐元年三月起擔任崇政殿說書，為宋哲宗講讀經筵，亦由朱光庭推薦。<sup>71</sup> 元祐初期，另一名言路官左司諫王巖叟（1043-1093）也曾多番推薦程頤，推舉奏文中甚至有「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的評價。<sup>72</sup>

綜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自元祐元年程頤入朝前後，有一批當朝言路官與程頤有著相當親近的私人關係。這些言路官包括時任左正言朱光庭、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賈易、侍御史杜純（1032-1095）等在內。左右正言、左右司諫都是元豐改制後的正職諫官，分隸中書、門下兩省，專責諫奏君主、批評政事、彈議百官，是作為

<sup>68</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4，「元祐二年八月辛巳」，頁 9830。

<sup>69</sup> 同前引，卷 369，「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頁 8910；卷 365，「元祐元年二月辛未」，頁 8773。並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92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卷 2010，朱光庭〈乞以程頤為講官奏〉，頁 366。元豐八年程顥過世後，朱光庭作為主要弟子，亦曾撰寫追悼文字。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附錄，〈門人朋友敘述並序〉，頁 331-332。

<sup>70</sup> 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 1，〈朱公揆錄拾遺〉，頁 351-359；卷 2，〈朱公揆問學拾遺〉，頁 360-365。

<sup>71</sup> 朱光庭首薦程頤一奏，李燾據呂大防《政目》，繫日為元祐元年二月十二日。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9，「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頁 8910。關於程頤任職經筵經過，參吳國武，〈程頤入侍經筵考——兼談朱熹的講讀活動及程朱系譜的形成〉，收入陳來、朱傑人編，《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 880 周年紀念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98-112。

<sup>72</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9，「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頁 8910。朱熹併將王氏此奏抄入〈伊川先生年譜〉。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附錄，頁 339。

「天子耳目」的言路官代表。<sup>73</sup> 元祐初年，包括左右諫議大夫、左右正言、左右司諫在內的正職諫官，有一半處於程頤交遊網絡之內。而時任左諫議大夫的鮮于侁，亦曾向程頤問學。<sup>74</sup> 換言之，程頤出仕之時，出身改制前諫院系統的六位正職諫官，除了右諫議大夫孫覺、右正言王覲 (1036-1103) 無明顯偏向外，有四位均親近程頤。

私人關係以外，更重要的是，這批與程頤親近的言路官在政治理念與立場方面亦有與程頤互通聲氣之嫌。前述王巖叟、朱光庭等屢薦程頤，自不待言。元祐元年，程頤與蘇軾 (1037-1101) 兄弟交惡，支持雙方的言路官發生衝突，王、朱借蘇軾所撰館策試題一事發難，累章彈奏。<sup>75</sup> 時任殿中侍御史呂陶就曾提出，許多士大夫認為「程頤與朱光庭有親，而蘇軾嘗戲薄程頤，所以光庭為程頤報怨而屢攻蘇軾」。<sup>76</sup> 呂陶之說可能有誇張失實之處。但是朱、王等言路官與程頤政治立場之互為呼應，卻是事實。同理，元祐二年七月杜純、賈易力劾呂陶，朝論亦有「賈易為程頤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之說。<sup>77</sup> 換言之，在元祐元年程頤入朝前後，朝中確有輿論，認為圍繞程頤正在形成一個以言路官尤其是諫院官員為主的黨派小團體。由於這一團體內部存在著私人交誼與政治理念的雙重紐帶，其引人側目也就不足為奇了。<sup>78</sup> 瞭解到這一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孔文仲為何在元祐二年八

<sup>73</sup> 北宋元豐改制前後諫院職能、員額變化較為複雜，學界意見不一。此處主要參考刁忠民、虞雲國兩先生說法。參刁忠民，《宋代臺諫制度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9），頁 115-127；虞雲國，《宋代臺諫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19-38。

<sup>74</sup> 問學一條參程頤、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 7，〈胡氏本拾遺〉，頁 395-396。

<sup>75</sup> 事詳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頁 9564-9573。程頤、蘇氏兄弟黨爭始末，前人研究甚夥，參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 488-492；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146-171；王曾瑜，〈洛、蜀、朔黨爭辨〉，收入吳榮曾等，《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351-369；張曉宇，〈從黃隱事件再論元祐初期政局與黨爭〉，《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6（香港：2018），頁 13-19；Ari Daniel Levine,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99-125; Ari Daniel Levine, "Che-tsung's Reign (1085-1100) and the Age of Faction," in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84-531.

<sup>76</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頁 9568。

<sup>77</sup> 同前引，卷 403，「元祐二年七月乙丑」，頁 9816。

<sup>78</sup> 當然，就實質而言，不宜過分誇張程頤在當時高層政治中的影響力。朝論所指責的程頤之黨，亦可能隸屬於一個更大的政治團體，比如呂公著、司馬光之舊黨。朝論與政治現實之間存在著實質距離，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此點觀察筆者受匿名審查人啟發，特此致謝。

月一奏中，反覆強調程頤「歷造臺諫」之事。<sup>79</sup> 程頤本來就與不少諫官交好，而又私下造訪孔氏，以求呂陶求職。這一舉措，具有強烈的黨派排他性質。孔奏中論程氏造臺諫時「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時當排擊此人」，正是劉安世元祐三年奏中批評程頤「陰邪潛伏」一語注腳。

劉安世以「陰邪潛伏」批評程頤自然有他的偏見。元祐初年，程頤聲名大行於天下。劉氏本師司馬光首薦程頤。在這種大環境下，與程頤親近的言路官支持程頤，亦可用「內舉不避親」加以解釋。然而劉安世堅守言路制度，憂心程頤「交結言路」的先例會影響相關官員監察人事的「公議」立場，導致他以程頤為陰邪之「鬼」。而另一條劉安世厭惡程氏的理由，則需要從「進不以道」這四字批評來理解。

元祐元年三月程頤入侍經筵後，即以「得君行道」為己任。在正式任職以前，程氏在論經筵劄子中已自許「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sup>80</sup> 在元祐元年三月到二年八月短短一年多以內，程頤提出了許多一新耳目的意見，尤其力倡改革經筵和太學國子監制度。但是，由於程氏銳意挑戰經筵慣例，加上他在朝政其他方面的一些議論，招致許多朝臣不滿。後來長遠影響南宋政局的道學家與官僚集團之角力，其兆始於此時。<sup>81</sup> 上文提到與劉安世有舊的劉摯，此時也專呈進奏批評程頤。<sup>82</sup> 程頤驟躋顯位，高倡經筵改革，恢復坐講、夏天不罷講等「舊禮」，以儒家士人之師道尊嚴限制君主權威，這在當時一些大臣看來誠可謂不切實際。據劉安世晚年回憶，首薦程頤的司馬光在某次對談中提到人臣進諫君主之禮，即以程頤經筵諫哲宗折柳事為反面教材。司馬光言道：「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sup>83</sup> 這一條材料中司馬光只以「老儒」指稱程頤。另一次追憶中，劉安世提到：「元祐中，閒見君實，已深不喜正叔，君實亦作俚語曰：『幾時教你如此崛起來？待陽還

<sup>79</sup> 據孔奏所言，程頤造訪其門在元祐二年五月右遷左諫議大夫以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1，「元祐二年五月戊辰」，頁 9761。此時距離程頤同年八月外放出京只有數月之差，在元祐黨爭的大氣候影響下，朝廷已經開始清理親程頤的政治勢力。參張曉宇，〈從黃隱事件再論元祐初期政局與黨爭〉，頁 13-19。

<sup>80</sup> 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 5，〈論經筵第三劄子〉，頁 540。程頤「得君行道」之心態分析，參張曉宇，〈理學與皇權——兩宋之際「聖學」觀念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4（臺北：2021），頁 666-667。

<sup>81</sup>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456-848。

<sup>82</sup> 張曉宇，〈從黃隱事件再論元祐初期政局與黨爭〉，頁 14-15。

<sup>83</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49，頁 6b。晚年劉安世對司馬光針對程頤之批評，仍「嘆息久之」，可見記憶之深刻。



起居舍人，與罷了經筵。」<sup>84</sup> 可見程頤入侍經筵後的激進姿態，連曾經推薦他的司馬光都不能忍受。

元祐中司馬光與劉安世談話裡透露「深不喜正叔」，主要是因為程頤經筵講習時對待哲宗過分嚴肅，使年輕的哲宗畏懼儒生，進而反感儒學。司馬光評價中的「崛起」二字，尤其反映了朝中官僚針對程頤的一種普遍心態。這種心態，用劉安世批評「五鬼」的話來說，正是「進不以道」。在彈章中，劉安世以歐陽棐為代表，提出歐陽百日之內升遷三次，超逾常規而開小人僥倖之門。<sup>85</sup> 劉氏曾目睹熙豐新貴扶搖直上，晚年曾親口提及王安石之大害在開小人僥倖一路。<sup>86</sup> 他對士人通過超遷「崛起」之路，向來不齒。彈章中所用「進不以道」四字，正是北宋中期以來批評士人或士大夫僥倖進用的習見政治術語。<sup>87</sup> 劉安世元祐初目睹程頤入主經筵的崛起過程，聯想熙豐政治之進用小人，「進不以道」之批評，可謂有的放矢。

經過以上梳理，劉安世批評「五鬼」所謂「陰邪潛伏，進不以道」者，在元祐初年歷史語境下皆有所實指。就制度邏輯而言，劉安世以言路官為朝官骨幹，認為「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當為臺諫，抑制宰執權力。<sup>88</sup> 而程頤以己身所任之經筵與宰執對舉，倡議經筵才是天下重任。由於經筵制度的特殊性，自身士人亦有機會通過個人聲望成為帝王講讀。程頤任講讀時，自尊以為帝師，他的經筵改革雖不成功，客觀上還是啟發了後人進一步利用經筵影響帝心的可能性。程頤以降的道學家尤善利用經筵制度，不少程門後學如楊時、邢恕、胡安國 (1074-1138)、尹焞 (1071-1142)、王蘋 (1082-1153) 等，都曾擔任講讀。<sup>89</sup> 朱熹說劉安世批評程頤是

<sup>84</sup> 此條據李燾言出自呂本中所撰筆記《紫微雜說》，引自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4，「元祐二年八月辛巳」，頁 9831。查今本《紫微雜說》（筆者所用為《全宋筆記》版本），不見此條，李燾所見《紫微雜說》當出別本。呂本中，《紫微雜說》，收入朱易安主編，《全宋筆記》第 3 編第 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sup>85</sup>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歐陽棐差除不當〉八，頁 23b。

<sup>86</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49，頁 3b。

<sup>87</sup> 「進不以道」作為專用政治術語，略舉兩例：仁宗朝名相劉沆 (995-1060)，時有「進不以道」之譏。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4，「嘉祐元年九月癸卯」，頁 4448。此說所指，乃是劉沆進用參知政事時為仁宗寵妃張貴妃所薦一事，事見同前引，卷 170，「皇祐三年三月己未」，頁 4084。另一例出於劉摯彈劾章惇奏章，其云章惇附會王安石，「進不以道」，以僥倖進用。見劉摯，《忠肅集》（中華書局本），附錄一，〈劉摯奏議遺稿〉，頁 600。

<sup>88</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1，頁 1b。

<sup>89</sup> 相關研究，參吳國武，〈程頤入侍經筵考〉，頁 109-112；Cheung Hiu Yu, "Consolidation of the 'Cheng School': Yang Shi and Yin Tun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34.1 (2021), pp. 136-145.

因為「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sup>90</sup> 此說得之而論有未盡。在循科舉正途入仕的劉安世看來，<sup>91</sup> 程頤以經筵為天下重任，兼而交結言路，不僅是對既有官僚系統的挑戰，更重啟熙豐以來小人弄權干政的僥倖之門。這才是劉安世批評程頤「陰邪潛伏，進不以道」的真正用心。

#### 四、晚年劉安世與楊時的學術交織

就現存史料來看，元祐以後，劉安世與程頤並無交集。哲宗親政不久，重開新法。作為舊黨元老司馬光愛徒，從哲宗紹聖至徽宗政和，十數年間劉安世歷經政治打壓，終與程頤並列「元祐黨人」，成為朝廷罪臣。<sup>92</sup> 崇寧年間，蔡京（1047-1126）主政下劉安世連續謫貶，最後勒停峽州羈管。<sup>93</sup> 大觀元年（1107）九月，在壓抑的政治氣氛中，程頤離世。大觀四年，朝廷對劉安世的監管才稍微放鬆。時安世已年邁六十，以承議郎從七品之卑階，放還較近帝都的應天府（河南商丘，北宋之南都）。<sup>94</sup> 晚年的劉安世，雖以謫官身分客居應天府，卻仍不避當時政治忌諱，經常與來往士人和士大夫談論。朱熹對此有生動之描述：「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歷歷為說平生出處，無小回護。群小雖睥睨，不敢動著他」。<sup>95</sup> 在當時政治環境下，過往者訪問劉安世自需承擔一定風險。然而由於劉氏聲望極高，「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sup>96</sup> 即使是待罪謫官之身，來訪劉安世的士人學者仍絡繹不

<sup>90</sup>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0，「自熙寧至靖康用人」，頁 3107。

<sup>91</sup> 劉安世對北宋科舉的看法，參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1，頁 4a-4b。

<sup>92</sup> 劉安世自承名列總數七十八人的「元祐黨人」之一員，見胡理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4b。元祐黨籍具體人數和黨人姓名，南宋初已有爭議。紹興四年（1134），吏部侍郎陳與義（1090-1138）就曾提出尋訪黨籍真本，以為黨人平反。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 5 冊，〈職官〉76 之 46，頁 5122。時任給事中張綱（1083-1166）曾提出徽宗時有兩本黨人碑記，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零九人。前者為崇寧年間的早期版本，則近於劉安世所見名單。見張綱，《華陽集》，《四部叢刊三編》第 46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36），卷 18，〈看詳元祐黨人狀〉，頁 8b。三百零九人本黨人名單見程榮秀本。李心傳，《道命錄》，卷 2，〈元祐黨籍碑〉，頁 4b-7a。

<sup>93</sup> 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 19，〈劉諫議安世傳〉，頁 14a。

<sup>94</sup> 脫脫等，《宋史》，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4。

<sup>95</sup>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0，「自熙寧至靖康用人」，頁 3125。

<sup>96</sup> 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八朝名臣言行錄》，《朱子全書》第 12 冊，《三朝名臣言行錄》，卷

絕。《元城先生語》、《譚錄》、《道護錄》這三部現存的劉安世對話集，都是他寓居應天府時與學者們的對談錄。<sup>97</sup> 此外，劉安世受劉摯之子劉跂所託，為劉摯文集作序亦在此時。<sup>98</sup> 謫居並沒有影響到劉安世的人際交往。他與程頤弟子楊時的相遇，也正是發生在這一時期。

劉安世與楊時相遇，最早可追溯到政和元年。當時楊時受任杭州蕭山知縣，由京師赴任途中經過應天府。元年二月三日，楊時到達南都，拜訪劉安世。彼時楊為五十九歲，劉六十二歲，可謂平輩。二月三日一見後，四日劉安世即回訪楊時。八日劉安世再宴請楊時。<sup>99</sup> 數日之間，劉、楊已相見數次，頗為投契。契合之緣由，固然有名望因素在內，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原因，亦即二人對《易》學的共同追求。

劉安世之《易》學，自然有師承淵源：其師司馬光所著《易說》以史釋《易》，強調以易理配人事。<sup>100</sup> 由於天人匹配、預昭史事的性質所然，司馬光《易》學非常重視象數一面，提倡「義出於數」。換言之，必須先闡明自然之「數理」，才能推斷人事道德和史事演變之「義」。<sup>101</sup> 劉安世作為司馬光愛徒，深受象數之學影響。他在大觀年間與馬永卿對談中，卜算北宋初年收復北漢之役，並預

12，頁 799。

<sup>97</sup> 《元城先生語》成書最遲，大概在 1135 至 1136 年（《宋儒學案》繫為紹興六年；《宋元學案》為紹興五年），是馬永卿於老師劉安世死後整理的對談記錄。對話發生在大觀三年至四年之間。《譚錄》最早，為韓瓘所記政和二年（1112）至宣和二年（1119）劉安世語錄。《道護錄》為宣和六年胡理所記語錄。這幾部對談錄的作者背景和成書歷程，參邱佳慧，《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頁 28-42。田智忠認為這幾部書都不太關心哲學問題，只是因為《諸儒鳴道集》本身對「道」的理解寬泛，才被收入其中。田智忠，《《諸儒鳴道集》研究》，頁 248。

<sup>98</sup> 劉跂託書有宣和四年與宣和六年二說。中華書局本劉摯文集《忠肅集》據文津閣《四庫全書》點校劉安世原序，訂為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劉摯，《忠肅集》（中華書局本），〈原序〉，頁 666。文淵閣《四庫全書》乃作宣和六年七月六日。劉摯，《忠肅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4 冊，卷首，〈原序〉，頁 1a。中華本此處並無出校解釋差異。考此〈序〉劉安世自署「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宣和六年劉已復直龍圖閣學士。署名今無直龍圖閣，當以宣和四年說為上。又，景印自清乾隆聚珍版的《叢書集成初編》本《忠肅集》，劉安世序首亦為「宣和四年」。見劉摯，《忠肅集》，《叢書集成初編》第 191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原序〉，頁 1。

<sup>99</sup> 以上日程均參張夏輯，《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8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上，頁 22b。

<sup>100</sup> 余敦康，《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 50-68。

<sup>101</sup> 司馬光《易》學的象數不僅見於《易說》，亦見於其所著《潛虛》。相關分析，見林素芬，〈司馬光易學思想蠡測〉，《東華人文學報》，13（花蓮：2008），頁 67-110。

測導致河東地區再次淪陷的靖康之禍，正是司馬光之學的反映。<sup>102</sup>

然而在《易》學方面，劉安世並非單重象數。筆者之所以有此推論，得益於一條關於安世《易》學的新材料。這條材料獨見於南宋法書集成《寶真齋法書贊》，是一份書簡。文曰：

示諭康節之語，固嘗聞之。安世每疑其太高。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安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妄〔忘〕象，得象妄〔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明公以為如何？安世上。<sup>103</sup>

此簡雖無年月，然以「明公」敬謂啟者，且有「示諭康節」之語，大概是劉安世寫給某位與邵雍相識之大臣。以安世之性格，紹聖外貶以後，當不與中央新黨大臣通簡。簡中提到「明公」示以邵雍論《易》之象數學，則「明公」自必與邵雍交好。筆者推測，大概不出於司馬光、富弼 (1004-1083) 等與邵雍來往密切、且與易理頗有心得之洛陽眾老。據此推論，此簡應作於元祐時期或以前。而簡中所謂「其在象數者，皆寓也」，可見劉安世一直頗為重視象數背後「與民同患」之理。

大觀三年至四年，馬永卿訪問寓居南都的劉安世。據永卿《元城先生語》所記，其時劉安世頗好談《易》，與之詳論伏羲、周文王、孔子 (551 B.C.-479 B.C.) 三聖演卦並〈繫辭〉內容。<sup>104</sup> 大觀四年下一年即政和元年。正是在這一年左右，楊時自程頤另一高足謝良佐 (1050-1103) 手中得到一部程氏《易傳》稿本，並於四年後出版校正以後的《伊川易傳》。<sup>105</sup> 為了校訂、編次、刪潤程氏《易傳》，政和初年楊時正專心治《易》。政和元年二月，劉、楊二人於南都相見之時，兩人的學術興趣正好於《易》學重疊。

<sup>102</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0，頁 9b-10b。此外，與司馬光相同，劉安世對揚雄《太玄經》的術數理論尤其著意。相關議論參馬永卿錄，《懶真子錄》，《歷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3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4，頁 117。

<sup>103</sup> 岳珂編，《寶真齋法書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 冊，卷 16，〈劉忠定書簡帖〉，頁 5b。

<sup>104</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1，頁 14a-14b。

<sup>105</sup> 楊時，《楊時集》，卷 25，〈校正伊川易傳後序〉，頁 675-676。楊本《易傳》出版經過參 Cheung Hiu Yu, "Consolidation of the 'Cheng School,'" pp. 129-130; 陳石軍，〈程頤《易傳》成書流傳新論〉，《周易研究》，4（濟南：2021），頁 56-63。

考慮到上述學術背景，不難想像劉、楊會面數天內的討論主題必然包括《易》學。政和元年二月九日，楊時拜別劉安世，赴任蕭山。途中撰成一信寄與安世。此信前半部分借劉安世贈予楊時的一部《易》學專著入題，專論《易》經「復」卦卦理。該《易》學專著即為許丞所著《易義》，其中論「復」卦卦義有「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數語。<sup>106</sup> 這裡「東方之情」、「東方之德」的說法，源於漢元帝時陰陽學家翼奉的理論，屬於數占一派，與同時代的京房 (78 B.C.-37 B.C.)《易》同源。<sup>107</sup> 清儒惠棟 (1697-1758)《易漢學》以翼說屬之京房《易》算法，甚確。<sup>108</sup> 許丞《易義》既引翼說，其書亦當為象數一流，故為劉安世所注意。

但是，劉安世將《易義》推薦給楊時之時，楊氏卻不以為然。楊時以《孟子》周文王、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為例，提出「怒」與「惡」之間不能簡單劃上等號。他又以《論語》所謂「顏子不遷怒」為例，論述「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sup>109</sup> 楊時這一以「顏子不遷怒」為中節的說法，正是引申自其師程頤名文〈顏子所好何學論〉所謂顏子「勉而後中節」之說。<sup>110</sup> 而楊氏綜合二例，提出修身、治世本為一事，天下之道本於正心誠意，乃循其師儒者之「道」一以貫之的理路而來。他在信中直言：「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sup>111</sup> 「今日學者」之弊，從《易》學上來說，固是象數瑣碎之弊。但從更廣闊的形而上層面而言，又何嘗不是主觀之我與客觀之物的割裂之弊呢？

前文云及，自元祐起，劉安世已認為《易》學象數背後寓有「與民同患」的義理。政和元年楊時所論修身、治世本為一事，對他來說不啻一大啟發。事實上，與楊時的這一次討論對劉安世影響深遠。十數年後，宣和六年冬天，劉安世在與楊時門人胡理的對談中還提到：「大凡今之學者，言象數則諱談義理；言義理則恥說象數。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是兩者兼通，始

<sup>106</sup> 楊時，《楊時集》，卷 19，〈與劉器之〉，頁 516。

<sup>107</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75，〈翼奉傳〉，頁 3168，並見孟康《漢書音義》相關疏解。以六方（東、南、西、北、上、下）匹配六情（怒、惡、喜、好、樂、哀）是翼奉陰陽學的代表理論。

<sup>108</sup> 惠棟，《易漢學》，《叢書集成初編》第 45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5，頁 78-79。

<sup>109</sup> 楊時，《楊時集》，卷 19，〈與劉器之〉，頁 516。

<sup>110</sup> 程頤、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 8，〈顏子所好何學論〉，頁 578。

<sup>111</sup> 楊時，《楊時集》，卷 19，〈與劉器之〉，頁 517。

得」。<sup>112</sup> 與劉安世論《易》者自然絕非楊時一家。但從劉氏晚年綜合象數、義理的《易》學觀點來看，政和初與楊時南都論學一事，大概有著潛移默化的因素在內。<sup>113</sup>

通過劉安世晚年與胡理的對話，可見他受楊時影響之處。但是劉氏堅持不廢象數，這一點與楊時繼承自程頤重義理而輕象數之《易》學仍然判為二途。<sup>114</sup> 劉安世的弟子李光 (1078-1159) 著有《讀易詳說》十卷，今存。此書多以《易》傳卦爻之理配附史事，《四庫》館臣以為《易》學「史事派」之開創者。<sup>115</sup> 《讀易詳說》對歷史時勢尤其是「時中」理念的強調十分明確，與程頤一派《易》學強調義理超越時間而自存的「內聖」派存在顯著分別。<sup>116</sup> 簡要而言，李光《易》學，與司馬光《易說》以史釋《易》理路頗近。其論象數之用，亦以推斷時勢為主。《讀易詳說》中以箕子去殷為例，提出「古之聖賢當昏亂之時，出處去就，其精微如此。非深達乎天下之事變、明乎象數之幾深者，孰能與于此哉」。<sup>117</sup> 換言之，李光仍然認為象數是《易》學不得不深研的第一原理。劉安世作為李光之師、司馬光之徒，其《易》學承先啟後。推測基本特徵，大概也常以象數推論時勢、史事。<sup>118</sup> 馬永卿所錄《元城先生語》有一條記載劉安世與之論《易》，提到春秋時魯襄公祖母穆姜之死。劉氏引《春秋左氏傳》「往而筮之，還艮之八」之說，以證穆姜留居東宮為不吉實為先儒治《易》本意，明顯表現出以象數推斷史事的傾向。<sup>119</sup> 從更寬廣的兩宋之交《易》學視角來看，司馬光、劉安世、李光一脈，與程頤、楊時一脈，就理論層面而言是兩條平行線。而劉安世與楊時政和元年之會，正是兩條平行線交匯之時。可惜由於劉安世沒有留下專門的《易》學著作，我們無法全面考察其《易》學具體形態了。

宣和六年劉安世與胡理的對談，反映了安世晚年與楊時長達十餘年之交往。胡

<sup>112</sup> 胡理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4a-4b。

<sup>113</sup> 劉安世在與胡理對話中強調「與楊中立以下十餘人論《易》」，可見《易》學層面予其啟迪最深者仍為楊時。同前引，頁 4a。

<sup>114</sup> 楊時論孔子《易》學之本質，即以「得意而忘象」為主旨。參考楊時與劉安世好友、福建名儒陳瓘 (1057-1122) 論邵雍學術一書。楊時，《楊時集》，卷 19，〈答陳瑩中〉，頁 521。

<sup>115</sup>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50。

<sup>116</sup> 李光「時中」之義及與程氏《易》學分野，參梁從峨，〈李光易學的「時」義探析〉，《周易哲學》，139（濟南：2019），頁 26-32。

<sup>117</sup> 李光，《讀易詳說》，《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 冊，卷 6，頁 26b-27a。

<sup>118</sup> 劉安世大概受司馬光影響，頗喜論史。《元城先生語》尤多論漢、唐、宋（本朝）三代史事者。

<sup>119</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1，頁 9a-9b。

理，常州晉陵人，登宣和三年第。<sup>120</sup> 先是六年春二月，胡瑛執楊時、劉摯薦書，面謁劉安世，寒暄家常，談及了一些劉氏生平大事。同年冬天，胡瑛自京師述職南歸，再次經南都應天府拜謁劉安世。這一次二人圍繞楊時有更具體的討論。其時楊時已七十二歲，寓居毗陵，驟蒙朝廷賜以祕書郎之職事，相召入京，面臨人生最後一次「得君行道」之機會。耐人尋味的是，楊時這次機會，卻與當時權臣蔡京有關。劉安世詢問胡瑛楊時為何人推薦時，胡氏說是蔡京長子蔡攸 (1077-1126)。<sup>121</sup> 根據劉安世、楊時共同的學生福建學者劉勉之 (1091-1149) 追憶，先是蔡京從子蔡樞 (?-1147) 向京、攸父子推薦福州懷安人張巒 (1088-1138)，以作為蔡家塾師。張巒把握機會，再向蔡京、蔡攸推薦楊時。<sup>122</sup> 通過以蔡家為中心的這一福建士人網絡，楊時得以進入了朝樞中心。<sup>123</sup>

針對宣和六年冬楊時出處問題，劉安世保有疑慮，畢竟蔡黨是惡名昭著的權臣集團。同年春天，劉安世聽聞李光為蔡攸薦引時，在胡瑛面前不禁吐出「失身」之語。<sup>124</sup> 然而楊時始終是胡瑛老師、劉安世同輩。劉安世在胡氏面前只以「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表達了個人疑慮。<sup>125</sup> 尤須注意者，第二次與胡瑛相見時，劉安世自己剛好復職直龍圖閣學士。<sup>126</sup> 這一復職雖無實際差遣，但在胡瑛乃至劉安世看來，代表了朝廷風向有所鬆動，不再一味打壓他們口中的「天下正人」。從這一角度來看，楊時為蔡家所薦，不失為新氣象下的一種指標。劉安世大概考慮到這一點，遂對楊時出仕並無過激反應。

宣和七年，劉安世逝世。宣和六年見證了劉安世與道學圈子最後的交流。在最後一次與胡瑛對談中，安世反復強調「誠」才是儒家學者達道之「根本」，他也是靠此一字面對人生禍福。這次對話中，劉說得一半，突然反問胡瑛其師楊時如何理解學者「根本」。胡瑛回答楊時喜歡講「仁」為大公之道。劉安世聽後，仍然堅持「誠」才是最終「根本」，提出「誠」已然包括「仁」在內。他且以造酒為喻：只

<sup>120</sup> 胡瑛生平簡略見史能之編修，《咸淳昆陵志》，卷 17，「人物」，頁 7a-7b。

<sup>121</sup> 胡瑛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3b。

<sup>122</sup> 這一舉薦過程在朱熹與學生葉味道、李儒用對談中有極生動之描述。參黃士毅編，《朱子語類彙校》，卷 101，〈楊中立〉，頁 2553-2554。

<sup>123</sup> 當然，借蔡家推舉楊時之勢，楊時其他友人亦有助力，比如同為程頤門人的溫州士大夫許景衡。參楊時，《楊時集》，卷 21，〈與許少伊〉其二，頁 585。

<sup>124</sup> 胡瑛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2b-3a。劉安世與李光交誼，見脫脫等，《宋史》，卷 363，〈李光傳〉，頁 11335-11336。

<sup>125</sup> 胡瑛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2b-3b。

<sup>126</sup> 劉安世復職直龍圖事在宣和六年十一月一日。同前引，頁 3b。

有準備「腳」（酒的底料）的過程做好了，才談得上酒好與不好。「誠」就是造酒（修德）之「下腳」。<sup>127</sup> 劉安世強調「誠」，楊時強調「仁」和「天理」，自是截然不同。

「誠」是司馬光傳給劉安世的學問精要，也是其一生思想所繫。如果深入考察劉安世「誠」說，當會發現其與楊時論「誠」之說也存在著顯著分別。楊時「誠」說繼承自程頤，強調「至誠」的本體論概念，將「誠」與天之德性（天之道）連繫起來。<sup>128</sup> 他在回答胡瑗關於《論語·憲問》「不逆詐，不億不信」的問題時，提出「惟至誠為可以前知」，即以「誠」為先天本體之德，深藏於內心之中。<sup>129</sup> 在楊時看來，《大學》修、齊、治、平一路，即由內心之「誠」意發動而來。<sup>130</sup> 楊時這一說法，實則是程頤「無妄之謂誠」之說的展開。程說最重要的表述見於《易傳》「無妄」卦說。其論「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與楊時「誠」說可謂一脈相承，皆重「由內而外」的心靈修養。<sup>131</sup>

劉安世之說「誠」，則與楊時、程頤相反。他年輕時拜見司馬光，不知「誠」之一字如何入門。司馬光告之要訣，乃是「不妄語」三字。<sup>132</sup> 相較程頤「無妄之謂誠」之教，「不妄語」僅多出一「語」字，卻與程氏心性修養之道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劉安世乃至司馬光的「不妄語」，是踐履層面的實際行為。劉氏得聞司馬一言後，「自此不敢妄語」。他在與馬永卿談話中，提及當時天下詐偽之風流行，「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sup>133</sup> 可見劉氏所認為的「誠」，並非內心中源自形而上層面「天之道」的「至誠」之意，而更貼近於一種外在的行為規範。劉安世所感佩的司馬光「誠意」，乃是「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sup>134</sup> 儘管劉安世也認同《中庸》「誠者，天之道」的基本定義，但是他晚年教導韓瓘把握「誠」的根本，仍是力行「不妄語」的外在踐履一路。<sup>135</sup>

<sup>127</sup> 以上所述，見同前引，頁 6b。

<sup>128</sup> 楊時，《楊時集》，卷 11，〈京師所聞〉，頁 294；〈餘杭所聞〉，頁 312。

<sup>129</sup> 同前引，卷 14，〈答胡德輝問〉其五，頁 406。

<sup>130</sup> 同前引，卷 11，〈餘杭所聞〉，頁 308-309。

<sup>131</sup> 程顥、程頤，《二程集》，《周易程氏傳》，卷 2，頁 822。關於程頤「誠」說發展以及後世道學家改造此說，參張曉宇，〈程頤「無妄之謂誠」說流變考〉，《東方文化》，51.2（香港：2023），頁 63-77。

<sup>132</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0，頁 11a。

<sup>133</sup> 同前引，頁 11b。

<sup>134</sup> 同前引，頁 8a。

<sup>135</sup> 參劉安世與韓瓘對話。劉安世自述，韓瓘錄，《劉先生譚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2，頁 1a-1b。



宣和六年，在與胡理最後一次對話之時，除了造酒的比喻，劉安世針對「誠」的本質另有一段深刻發揮：

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是無窮。<sup>136</sup>

「誠」作為劉安世安身立命的基礎，在他看來本質上並沒有天人之分。只是因為形骸存在，人們才有了「思誠」的「人道」進路。真正把握「天道」之「誠」的方法，並非求索心靈內在而與「至誠」連繫，而是由踐履「不妄語」等具體外在行為「觸類求之」「誠」的妙用。在人生最後時光，劉安世堅持了自己對「誠」的理解，找到了自己的「道學」。

## 五、結論

引言曾提及，本文主標題「道大不容」，取自楊時為劉安世所撰祭文中之警語。結合本文結論，此句警語可以詮釋為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亦為楊時本意，喻指劉安世的氣節成為了元祐有「道」君子之代表，而不為新黨執政之朝廷所容。此即政治層面之「道大不容」。第二層意義就學術思想而言：劉安世之「道」如果忠實呈現其面目，亦恐不能見容於以道南一脈為代表的正統道學敘事。此所謂思想層面之「道大不容」。元祐時期，劉安世彈劾元祐宰執以及道學宗師程頤的歷史事實，在南宋以降道學敘事中只能表現為語焉不詳的軼聞，或者朱熹口中的「見識有病」。

事實上，作為一位頗有名望的士大夫，劉安世交遊圈本就和程頤道學網絡不盡重合。觀察劉安世的社會關係網絡，確實他有些學生如胡理、李光、黃鏗等，與程門有所淵源。<sup>137</sup> 但是，劉氏大部分的朋友和弟子，包括曾開、曾幾 (1084-1166)、

<sup>136</sup> 胡理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5a。

<sup>137</sup> 關於劉安世的社會關係資料，筆者參考了「中國歷代人物 (CBDB)」資料庫 (<https://inindex.com/biog>，2023 年 6 月 20 日查詢)。黃鏗與劉安世之關係不見於 CBDB。劉安世另有兩小簡與黃鏗，見載於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與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據簡文語意，大概黃鏗亦為安世

陳瓘、蔡樞、孫偉、鄧弼亮等，本非程門中人，有些朋友如劉攽 (1023-1089) 和蘇軾，與程頤甚至是敵非友。在以《宋元學案》為代表的道學敘事中，劉攽、蘇軾等為程頤所不喜者首先被排除在劉安世「學案」以外。至於其他人等，由於與程門距離較遠，亦沒有得到重視。只有本身處於道學譜系之中的李光、胡理、劉勉之等學者，因有助於彌合劉安世道學世界中的形象，才擁有被記入〈元城學案〉直系譜系中的資格。<sup>138</sup>

值得注意，劉安世的形象本身就是片段式的。從楊時「道大不容」到朱熹編輯《三朝名臣言行錄》依據的劉安世「言行錄」，再到《宋元學案》中的〈元城學案〉，針對劉安世的歷史認知逐漸定型。他的政治性格和學術理念，被化約為敢言直諫的舊黨（朔黨）集團成員以及廣義的「道學門人」（司馬光之徒）。這類標籤反映了部分事實，同時也遮蔽了劉安世性格中更為複雜的一面。劉安世對王安石質樸好學的敬佩、<sup>139</sup> 他對劉攽諛語的包容、<sup>140</sup> 他對漢唐歷史人物心術的理解、<sup>141</sup> 他與蘇軾相知相得、<sup>142</sup> 以及他對蘇軾烏臺詩案處境之精妙分析，<sup>143</sup> 這些細節都隱藏在劉安世平時對話之中，為馬永卿等所記錄。這些「非道學」甚至「反道學」的片段，由於既定道學標籤的作用，遂被埋沒在歷史之中。事實上，收入劉安世語錄的《諸儒鳴道集》，亦因為所收各種文字「道學不純」而為後世道學史學者所忽略。要而言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劉安世形象，只是某一部分特定文獻所賦予的印象效果。在道學敘事建構過程中，由於建構者主觀意志的選擇，「親道學」的文獻片段比其他片段受到了更多注意，從而層累加固了這些學者親近道學的後設身分。劉安世的歷史形象正是這一建構過程的產物。

上文提及劉安世與學生的對話語錄。由於本文主題和材料數量所限，我們無法

後學一輩。參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118 冊，卷 2546，劉安世〈與黃鏗用和小簡〉，頁 173-174。此條材料承蒙趙元瑩君提示，特此銘謝。

<sup>138</sup> 反映全祖望《宋元學案》早期體例的黃氏補本《宋儒學案》，所記載的劉安世直系門人只有呂本中、劉勉之、馬大年、韓瓘、胡理、曾幾寥寥數人。見黃璋、黃徵又補修，《宋儒學案》，卷 17，〈元城學案〉，頁 1。然而在後來的刊本《宋元學案·元城學案》之中，與程門距離較遠的呂本中和曾幾，已被挪至其他學案。代替的是補入李光，顯著加強了他與胡理作為劉安世直系傳人的地位。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20，頁 819-820。刊本《宋元學案》的相關修訂，可以說帶有更明顯的道學敘事烙印。

<sup>139</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49，頁 3b。

<sup>140</sup> 同前引，頁 9b。

<sup>141</sup> 同前引，頁 10b-13a；卷 50，頁 1b-2a；卷 51，頁 8a-8b。

<sup>142</sup> 同前引，卷 51，頁 9b-10a。

<sup>143</sup> 同前引，頁 10a。

採用相關語錄進一步分析劉安世的政治與學術面向。但是，筆者想就語錄這一史料集群提出一點方法層面的思考，一方面作為本文結語，另一方面亦希望為將來的宋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啟示。

作為思想史家，我們當然希望盡量還原思想家的全貌。但是，由於材料尤其是文獻材料限制，許多時候這一還原工作並不能夠充分貫徹。馬永卿、胡理所記錄的劉安世平時談話相當有限，只能稍增我們對劉安世的性格瞭解，尤其是他在學術上的包容一面。在缺乏對話語境情況下，深入探討劉安世心態已是超出史家能力範圍的工作。朱熹曾題跋馬永卿等人所錄劉安世言行，其中他提到自己外舅年少時亦曾受教於劉安世：「睢陽間，為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sup>144</sup> 朱子此處提到「不可復得」處，乃是只有在對話中才能感受到的「俯仰抑揚」與「聲容相接」。士大夫的個性乃至心態，在這類對話「姿態」中能夠得到最直觀反映。當對話被記錄時，原來口述語境中的「姿態」與「聲容」業已流失泰半。

即便如此，以文字形式流傳至今的語錄，由於其介於口傳 (orality) 和書寫 (literacy) 之間的聽聞性質 (aurality)，還是能夠揭示士人一些具體的心態細節。<sup>145</sup> 劉安世語錄固然過於稀少而「文獻不足徵」，但在大量宋代語錄材料留傳至今的前提下，是否仍存在著從「姿態」和「聲容」切入探討思想史的可能性？<sup>146</sup> 道學和黨爭敘事以既定的概念節點 (conceptual reference points) 定位士人和士大夫：舊黨、新黨、道學家、反道學官僚，諸如此類，都是所謂的概念節點。深入考察士人討論這些節點時的「聲容」和「姿態」，比如他們的音容笑貌、肢體反應，有助於今人理解他們的情感面相，更準確地定位歷史人物的政治與思想屬性。即使在相對稀缺的劉安世語錄中，我們偶而亦能見到這類「聲容」與「姿態」的記載。比如馬

<sup>144</sup>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卷 81，〈跋劉元城言行錄〉，頁 3829。

<sup>145</sup> 「聽聞」概念取自歐洲中世紀史家喬思·科爾曼 (Joyce Coleman) 研究喬叟 (Geoffrey Chaucer) 作品傳播史的著作。參 Joyce Coleman, *Public Reading and the Reading Public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and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3, esp. pp. 27-32. 喬思此書將「聽聞」模式理解為面向小規模群眾朗讀書籍的行為，與宋代師生之間相對私人的對話環境自然有所區別。但是，宋代部分士人尤其是道學家重視語錄的口述語境，並有意識地將之記錄下來，仍體現了他們對口傳與書寫之間訊息整體性的理解和把握，參 Cheung Hiu Yu, "Consolidation of the 'Cheng School,'" pp. 132-136. 就這一點而言，引入「聽聞」概念對利用語錄的宋代思想史研究不無啟迪。

<sup>146</sup> 就現有材料而言，最大的可能性應該就是《朱子語類》了。除了包含一定「姿態」和「聲容」記錄的豐富內容外，《朱子語類》現存黎靖德與黃士毅二本在具體文字方面也足堪比對。

永卿初見劉安世之後三日，再次獻書求教。語錄記安世「再讀之，似有喜色」。<sup>147</sup>又據馬氏所記，素性嚴肅的劉安世，當年面對劉攽戲謔之語時，亦忍俊不禁。<sup>148</sup>胡瑛記劉安世追憶推薦陳瓘時，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軒渠一笑」。<sup>149</sup>這類記載許多時候固然過於簡略，但是它們所承載的「情感能指」(emotional signifier)，仍在傳遞著不絕如線的歷史溫度。從語錄或者其他材料中「聲容」與「姿態」的記載入手，確立承載「情感能指」的相關修辭與文字，在材料相對豐富情況下進行質性分析，甚至加以量化統計，相信有助於貼近北宋士人心態與真貌。<sup>150</sup>通過引入這種新方法視域，我們可以對現有一些概念節點再加以觀照，從而為思想史研究開闢出新的方向。

---

<sup>147</sup>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49，頁 1a。

<sup>148</sup> 同前引，頁 8b。

<sup>149</sup> 胡瑛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2b。

<sup>150</sup> 這方面的一個初步示例，可參張曉宇關於一位福建地方士人弔喪「姿態」的分析。張曉宇，〈「學統四起」下的北宋古禮運動——陳烈事跡的一個思想史考察〉，《新史學》，30.2（臺北：2019），頁 136-146。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王梓材 Wang Zicai、馮雲濠 Feng Yunhao 撰，張壽鏞 Zhang Shouyong 校補，《宋元學案補遺》*Song Yuan xue'an buyi*，收入張壽鏞 Zhang Shouyong 輯，《四明叢書》*Siming congshu* 第 5 集，張氏約園雕版印行本 Zhangshi Yueyuan diaoban yinxingben，1937。
- 史能之 Shi Nengzhi 編修，《咸淳昆陵志》*Xianchun Kunling zhi*，收入中國地志研究會 Zhongguo dizhi yanjiuhui 編，《宋元地方志叢書》*Song Yuan difangzhi congshu* 第 6 冊，臺北 Taipei：大化書局 Dahua shuju，1990，明崇禎十一年 (1638) 刊本影印本 Ming Chongzhen shiyi nian (1638) kanben yingyinben。
- 司馬光 Sima Guang，《傳家集》*Chuanjia ji*，《四部叢刊初編縮本》*Sibu congkan chubian suoben* 第 46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67。
- 朱 熹 Zhu Xi，《伊洛淵源錄》*Yiluo yuanyuan lu*，《四庫善本叢書初編》*Siku shanben congshu chubian* 第 315 冊，新北 New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5，影印中央圖書館藏明本四庫善本叢書 Yingyin Zhongyang tushuguan cang Mingben siku shanben congshu。
- 朱 熹 Zhu Xi 撰，朱傑人 Zhu Jieren 等主編，《八朝名臣言行錄》*Ba chao mingchen yanxing lu*，《朱子全書》*Zhuzi quanshu* 第 1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2。
- \_\_\_\_\_，《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Hui'an xiansheng Zhu Wengong wenji 5*，《朱子全書》*Zhuzi quanshu* 第 2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2。
- 呂本中 Lü Benzong，《紫微雜說》*Ziwei zashuo*，收入朱易安 Zhu Yi'an 主編，《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 3 編第 6 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2008。
- 佚名 Anonymous 編，《諸儒鳴道集》*Zhuru mingdao ji*，《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Zhonghua zaizao shanben, Tang Song bian* 第 192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2004，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南宋端平刻本 Yingyin Shanghai tushuguan cang Nansong Duanping keben。

- 吳任臣 Wu Renchen 撰，徐敏霞 Xu Minxia、周瑩 Zhou Ying 點校，《十國春秋》*Shiguo chunq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0。
- 李 光 Li Guang，《讀易詳說》*Du Yi xiangshuo*，《文淵閣四庫全書》*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李 燾 Li Tao 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Shanghai shifan daxue guji zhengli yanjiusuo、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Huadong shifan daxue guji yanjiusuo 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 李心傳 Li Xinchuan 撰，程榮秀 Cheng Rongxiu 刪補，《道命錄》*Daoming lu*，《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51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影元抄本影印 Ju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Qing ying Yuan chaoben yingyin。
- 杜大珪 Du Dagui，《名臣碑傳琬琰之集》*Mingchen beizhuan wanyan zhi ji*，《文淵閣四庫全書》*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45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呂本中 Lü Benzhong 撰，韓西山 Han Youshan 輯校，《呂本中全集》*Lü Benzhong quanji* 第 3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9。
- 岳 珂 Yue Ke 編，《寶真齋法書贊》*Baozhenzhai fashu zan*，《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81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 林 嗣 Lin Dong 編，《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Xinjian jueke gujin yuanliu zhilun*，臺北 Taipei：新興書局 Xinxing shuju，1970，明末翻刻元圓沙書院本 Ming mo fanke Yuan Yuansha shuyuan ben。
- 邵 博 Shao Bo 撰，劉德權 Liu Dequan、李劍雄 Li Jianxiong 點校，《邵氏聞見後錄》*Shaoshi wenjian houl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邵伯溫 Shao Bowen 撰，李劍雄 Li Jianxiong、劉德權 Liu Dequan 點校，《邵氏聞見錄》*Shaoshi wenjian l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俞文豹 Yu Wenbao 撰，張宗祥 Zhang Zongxiang 校訂，《吹劍錄全編》*Chuijian lu quanbian*，上海 Shanghai：古典文學出版社 Gudian wenxue chubanshe，1958。
- 紀 昀 Ji Yun 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2003。
- 徐 松 Xu Song 輯，劉琳 Liu Lin 等校點，《宋會要輯稿》*Song huiyao jig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4。

- 班 固 Ban Gu 撰，顏師古 Yan Shigu 注，《漢書》*Ha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 馬永卿 Ma Yongqing 錄，《嬾真子錄》*Lanzhenzi lu*，《歷代筆記小說大觀》*Lidai biji xiaoshuo daguan* 第 36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 張 夏 Zhang Xia 輯，《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Song Yang Wenjing gong Guishan xiansheng nianpu*，《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史部第 86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96。
- 張 綱 Zhang Gang，《華陽集》*Huayang ji*，《四部叢刊三編》*Sibu congkan san bian* 第 466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1936。
- 畢仲游 Bi Zhongyou，《西臺集》*Xitai ji*，《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12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 脫 脫 Tuotuo 等，《宋史》*Song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7。
- 惠 棟 Hui Dong，《易漢學》*Yihanxue*，《叢書集成初編》*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457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 曾棗莊 Zeng Zaozhuang、劉琳 Liu Lin 主編，《全宋文》*Quan Songwen*，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2006。
- 程 顥 Cheng Hao、程頤 Cheng Yi 著，王孝魚 Wang Xiaoyu 點校，《二程集》*Er Cheng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
- 黃 璋 Huang Zhang、黃徵乂 Huang Zhengyi 補修，《宋儒學案》*Songru xue'a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稿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Fu Sinian tushuguan cang Qing gaoben。
- 黃士毅 Huang Shiyi 編，徐時儀 Xu Shiyi、楊艷 Yang Yan 彙校，《朱子語類彙校》*Zhuzi yulei huiji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4。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著，全祖望 Quan Zuwang 補修，《宋元學案》*Song Yuan xue'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楊 時 Yang Shi 撰，林海權 Lin Haiquan 校理，《楊時集》*Yang Sh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8。
- 董 誥 Dong Gao 等編，孫映達 Sun Yingkuai 等點校，《全唐文》*Quan Tangwen*，太原 Taiyuan：山西教育出版社 Shanxi jiaoyu chubanshe，2002。
- 齋藤孝 Saito Takashi 等編纂，《李朝實錄》*Lichao shilu*，東京 Tokyo：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Gakushūin Tōyō bunka kenkyūjo，1953-1967。

- 劉 摯 Liu Zhi, 《忠肅集》 *Zhongsu ji*, 《叢書集成初編》 *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1912 冊, 上海 Shanghai: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36。
- \_\_\_\_\_, 《忠肅集》 *Zhongsu ji*, 《文淵閣四庫全書》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124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
- 劉 摯 Liu Zhi 撰, 裴汝誠 Pei Rucheng、陳曉平 Chen Xiaoping 點校, 《忠肅集》 *Zhongsu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2。
- 劉安世 Liu Anshi, 《元城先生盡言集》 *Yuancheng xiansheng jinyan ji*, 《四部叢刊續編》 *Sibu congkan xubian* 第 230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66。
- 歐陽修 Ouyang Xiu, 《新五代史》 *Xin Wudai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4。
- 黎靖德 Li Jingde 編, 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 《朱子語類》 *Zhuzi yule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6。

## 二、近人論著

- 「中國歷代人物 (CBDB)」資料庫 “Zhongguo lidai renwu (CBDB)” ziliaoku, <https://inindex.com/biog>, 2023 年 6 月 20 日查詢。
- 刁忠民 Diao Zhongmin, 《宋代臺諫制度研究》 *Songdai taijian zhidu yanjiu*,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1999。
- 王淑梅 Wang Shumei, 〈以「誠」為道：劉安世治學為政思想〉“Yi ‘cheng’ wei dao: Liu Anshi zhixue weizheng sixiang”, 《河北工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Hebei gongye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9, 天津 Tianjin: 2021, 頁 39-44。doi: 10.14081/j.cnki.cn13-1396/g4.000214
- 王曾瑜 Wang Zengyu, 〈洛、蜀、朔黨爭辨〉“Luo, Shu, Shuo dangzheng bian”, 收入 吳榮曾 Wu Rongzeng 等, 《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 *Jinxin ji: Zhang Zhenglang xiansheng bashi qingshou lunwenji*,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96, 頁 351-369。
- 平田茂樹 Hirata Shigeki 著, 林松濤 Lin Songtao、朱剛 Zhu Gang 等譯, 《宋代政治結構研究》 *Songdai zhengzhi jiegou yanji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0。
- 占旭東 Zhan Xudong, 《《盡言集》研究》 *Jinyan ji yanjiu*,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Huadong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 2006。
- 田智忠 Tian Zhizhong, 《《諸儒鳴道集》研究——兼對前朱子時代道學發展的考察》 *Zhuru mingdao ji yanjiu: jian dui qian Zhuzi shidai daoxue fazhan de kaocha*,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2。



- 成 鵬 Cheng Peng, 《劉安世政治思想述論》 *Liu Anshi zhengzhi sixiang shulun*,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大學碩士論文 Hebei daxue shuoshi lunwen, 2019。
- 吳國武 Wu Guowu, 〈程頤入侍經筵考——兼談朱熹的講讀活動及程朱系譜的形成〉“Cheng Yi rushi jingyan kao: jian tan Zhu Xi de jiangdu huodong ji Cheng Zhu xipu de xingcheng”, 收入陳來 Chen Lai、朱傑人 Zhu Jieren 編, 《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 880 周年紀念會論文集》 *Renwen yu jiazhi: Zhuzixue guoji xueshu yantaohui ji Zhuzi danchen 880 zhounian jinianhui lunwenji*,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1, 頁 98-112。
- 余英時 Yu Ying-shih,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Zhu Xi de lishi shijie: Songdai shidafu zhengzhi wenhua de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1。
- 余敦康 Yu Dunkang, 《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 *Neisheng waiwang de guantong: Beisong Yixue de xiandai chanshi*, 上海 Shanghai: 學林出版社 Xuelin chubanshe, 1997。
- 邱佳慧 Chiu Chia-hui, 《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 *Daoxue yundong zhong de Liu Anshi*, 臺北 Taipei: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Zhongguo wenhua daxue shi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2001。
- 林素芬 Lin Su-fen, 〈司馬光易學思想蠡測〉“Sima Guang Yixue sixiang lice”, 《東華人文學報》 *Donghua renwen xuebao*, 13, 花蓮 Hualien: 2008, 頁 67-110。doi: 10.6420/DHJHS.200807.0067
- 祝尚書 Zhu Shangshu, 《宋人別集敘錄》 *Songren bieji xul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9。
- 連 凡 Lian Fan, 〈論《宋元學案》對朔學的詮釋與評價——以司馬光及其弟子劉安世、范祖禹、晁說之為中心〉“Lun Song Yuan xue'an dui Shuoxue de quanshi yu pingjia: yi Sima Guang ji qi dizi Liu Anshi, Fan Zuyu, Chao Yuezhi wei zhongxin”, 《保定學院學報》 *Baoding xueyuan xuebao*, 6, 保定 Baoding: 2017, 頁 1-7。doi: 10.13747/j.cnki.bdxyxb.2017.06.001
- \_\_\_\_\_, 〈全祖望對司馬光及其弟子思想的詮釋與評價〉“Quan Zuwang dui Sima Guang ji qi dizi sixiang de quanshi yu pingjia”, 《焦作大學學報》 *Jiaozuo daxue xuebao*, 3, 焦作 Jiaozuo: 2018, 頁 5-13。doi: 10.16214/j.cnki.cn41-1276/g4.2018.01.002
- 陳石軍 Chen Shijun, 〈程頤《易傳》成書流傳新論〉“Cheng Yi Yizhuan chengshu liuchuan xinlun”, 《周易研究》 *Zhouyi yanjiu*, 4, 濟南 Jinan: 2021, 頁 56-63。

- 梁思樂 Leung Sze-lok, 〈朔黨與北宋元祐朋黨政治新論——以元祐五年以前朔黨與韓忠彥、文彥博、范純仁的關係為中心〉“Shuodang yu Beisong Yuanyou pengdang zhengzhi xinlun: yi Yuanyou wu nian yiqian Shuodang yu Han Zhongyan, Wen Yanbo, Fan Chunren de guanxi wei zhongxin”, 收入中國宋史研究會第 16 屆年會 Zhongguo Songshi yanjiuhui di 16 jie nianhui 編, 《「10 至 13 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 16 屆年會論文集》“10 zhi 13 shiji Zhongguo guojia yu shehui” guoji xueshu yantaohui ji Zhongguo Songshi yanjiuhui di 16 jie nianhui lunwenji, 杭州 Hangzhou: 杭州師範大學 Hangzhou shifan daxue, 2014, 頁 100-123。
- \_\_\_\_\_, 〈北宋朋黨政治研究模式的回顧與展望——以「洛蜀朔黨爭」說法為例〉“Beisong pengdang zhengzhi yanjiu moshi de huigu yu zhanwang: yi ‘Luo Shu Shuo dangzheng’ shuofa wei li”, 收入蔡崇禧 Choi Sung Hei、鄒陳惠儀 Chau Chan Wai Yi、梁思樂 Leung Sze-lok 主編, 《研宋三集》*Yan Song san ji*, 香港 Hong Kong: 香港研宋學會 Xianggang yan Song xuehui, 2016, 頁 47-62。
- 張從峨 Liang Cong’e, 〈李光易學的「時」義探析〉“Li Guang Yixue de ‘shi’ yi tanxi”, 《周易哲學》*Zhouyi zhexue*, 139, 濟南 Jinan: 2019, 頁 26-32。
- 張建坤 Zhang Jiankun, 《元祐學術群體的政治思想研究》*Yuanyou xueshu qunti de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長沙 Changsha: 湖南大學博士論文 Hunan daxue boshi lunwen, 2019。
- 張維玲 Chang Wei-ling, 《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Cong tianshu shidai dao guwen yundong: Beisong qianqi de zhengzhi guocheng*,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21。doi: 10.978.986350/5563
- 張曉宇 Cheung Hiu Yu, 〈從黃隱事件再論元祐初期政局與黨爭〉“Cong Huang Yin shijian zai lun Yuanyou chuqi zhengju yu dangzheng”,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 66, 香港 Hong Kong: 2018, 頁 1-22。doi: 10.29708/JCS.CUHK.201801\_(66).0001
- \_\_\_\_\_, 〈「學統四起」下的北宋古禮運動——陳烈事跡的一個思想史考察〉“‘Xuetong siqi’ xia de Beisong guli yundong: Chen Lie shiji de yi ge sixiangshi kaocha”, 《新史學》*Xin shixue*, 30.2, 臺北 Taipei: 2019, 頁 111-167。
- \_\_\_\_\_, 〈理學與皇權——兩宋之際「聖學」觀念的演變〉“Lixue yu huangquan: liang Song zhiji ‘shengxue’ guannian de yanbi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92.4, 臺北 Taipei: 2021, 頁 649-700。

- \_\_\_\_\_, 〈程頤「無妄之謂誠」說流變考〉“Cheng Yi ‘wuwang zhi wei cheng’ shuo liubian kao”, 《東方文化》 *Dongfang wenhua*, 51.2, 香港 Hong Kong : 2023, 頁 63-77。
- 張藝曦 Chang I-hsi, 〈史語所藏《宋儒學案》在清中葉的編纂與收藏〉“Shiyusuo cang *Songru xue’an* zai Qing zhongye de bianzuan yu shoucang”,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80.3, 臺北 Taipei : 2009, 頁 451-506。doi: 10.6355/BIHPAS.200909.0451
- 虞雲國 Yu Yunguo, 《宋代臺諫制度研究》 *Songdai taijian zhidu yanjiu*, 上海 Shanghai :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4。
- 葉健孚 Yip Kinfu, 〈歷史記憶的重塑：「洛蜀朔黨」考辨〉“Lishi jiyi de chongsu: ‘Luo Shu Shuo dang’ kaobian”, 收入《第二十屆兩岸四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中國古代史卷》 *Di ershi jie liang’an si di lishixue yanjiusheng lunwen fabiaohui lunwenji: Zhongguo gudaishi juan*, 開封 Kaifeng :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Henan daxue lishi wenhua xueyuan, 2019, 頁 245-255。
- 漆俠 Qi Xia, 《宋學的發展和演變》 *Songxue de fazhan he yanbian*, 石家莊 Shijiazhuang :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 2002。
- 熊本崇 Kumamoto Takashi 著, 馬曉地 Ma Xiaodi、輪田直子 Wada Naoko 譯, 〈權監察御史里行李定——關於王安石的對御史臺政策〉“Quan jiancha yushi lixing Li Ding: guanyu Wang Anshi de dui yushitai zhengce”, 收入近藤一成 Kondo Kazunari 主編, 《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 *Song Yuan shixue de jiben wenti*,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0, 頁 51-72。
- 羅火金 Luo Huojin、鄧新波 Deng Xinbo、黃吉軍 Huang Jijun, 〈北宋理學家劉絢墓志考釋〉“Beisong lixuejia Liu Xuan muzhi kaoshi”, 《洛陽考古》 *Luoyang kaogu*, 3, 洛陽 Luoyang : 2021, 頁 75-82。
- 羅家祥 Luo Jiaxiang, 《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 *Pengdang zhi zheng yu Beisong zhengzhi*, 武漢 Wuhan :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2。
- 龔延明 Gong Yanming、祖慧 Zu Hui, 《宋代登科總錄》 *Songdai dengke zonglu* 第2卷, 桂林 Guilin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4。
- Cheung Hiu Yu. “Consolidation of the ‘Cheng School’: Yang Shi and Yin Tun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34.1, 2021, pp. 111-146.
- Coleman, Joyce. *Public Reading and the Reading Public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and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e Bary, Wm. Theodore. “Reply to Hoyt Cleveland Tillm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 1994, pp. 143-144. doi: 10.2307/1399808

- \_\_\_\_\_. "The Use of Neo-Confucianism: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Tillm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3, 1993, pp. 541-555. doi: 10.2307/1399581
- Hartman, Charles. "Bibliographic Notes on Sung Historical Works: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Way and Its Destiny (Tao-ming lu)* by Li Hsin-ch'ua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0, 2000, pp. 1-61.
- Levine, Ari Daniel. "Che-tsung's Reign (1085-1100) and the Age of Faction," in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84-531. doi: 10.1017/CHOL9780521812481.008
- \_\_\_\_\_.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 Tillman, Hoyt Cleveland.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 1992, pp. 455-474. doi: 10.2307/1399273
- \_\_\_\_\_. "The Uses of Neo-Confucianism, Revisited: A Reply to Professor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 1994, pp. 135-142. doi: 10.2307/1399807

## “A Grand Way Excluded:” Liu Anshi (1048-1125) in the Shadow of Daoxue

**Cheung Hiu Yu**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ycheung@cuhk.edu.hk

###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is known for its complexity and obscurity. Under the great influence of Wang Anshi’s 王安石 (1021-1086) New Learning, many Northern Song scholars and scholar-officials searched for ways to access the ultimate Way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late Northern Song, when factional struggles were in their heyday,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threads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and profoundly shaped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officials. Through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Liu Anshi 劉安世 (1048-1125), a famous scholar-official who has been conventionally understood as an anti-reformist and a loose member of the Daoxue 道學 circl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mplex mentality of scholar-officials during the chaos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More concretely,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Liu Anshi resided and seeks to reveal his authentic self, especially his political stances and intellectual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Liu’s words and writings collected by his students and descendants, the article casts doubt on various Daoxue narratives that obscured the real Liu Anshi. Nevertheless, the study not only reconstructs Liu Anshi independently of these Daoxue narratives, but it also calls for a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meta-narrative of Song intellectual history.

**Key words:** Liu Anshi 劉安世, Cheng Yi 程頤, Daoxue 道學, anti-reformists, the *Song Yuan xue’an* 宋元學案

(收稿日期：2023. 11. 27；修正稿日期：2024. 1. 18；通過刊登日期：2024. 2. 26)

